

田野與文獻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麻城縣孝感縣」傳說與王朝正統

· 陳志剛

道教儀式與民俗文化——對江西省吉安縣侯氏家族「喊船」儀式的考察

· 黃天娥

晚清亂世中的華北鄉村——博愛縣寨卜昌村若干碑記釋讀

· 宋永志

維多利亞城的衛生政策——殖民者統治手法的演變與士紳社會的自治

· 黎傑長

活動消息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成員單位：

中山大學歷史系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廈門大學歷史系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

編輯委員會：馬木池、張兆和、陳春聲、程美寶、廖迪生、劉志偉、蔡志祥

執行編輯：黃永豪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季刊） 第五十五期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五日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 印製

ISSN: 1990-9020

通訊地址：

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Editorial Office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23587774

電子郵箱 (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 (Web Site): <http://schina.ust.hk>

「麻城縣孝感鄉」傳說與王朝正統

陳志剛
中山大學歷史系

有遷徙歷史的人群，其後代多聲稱來自同一個地方，這一現象一直為學人所關注。粵東地區很多客家姓氏譜牒都自稱來自福建寧化石壁。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則廣泛流傳著源自南雄珠璣巷的傳說。華北地區則廣泛流傳源自山西洪洞大槐樹的傳說。四川地區則廣泛流傳著源自麻城縣孝感鄉的傳說。過去學人對與「麻城縣孝感鄉」傳說相關的「張獻忠屠蜀」和「湖廣填四川」的歷史進行了相當的研究，¹如認為明初湖廣已陸續有移民入川，明末清初四川盆地內部因糧食匱乏而導致人口銳減十之八九，盆地周圍山區保存遺民較多。

在四川這樣遼闊的地域範圍內，有必要選擇一個較小的區域，對「麻城縣孝感鄉」的傳說進行縱深性及歷時性的研究。「傳統中國區域社會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努力瞭解由於漫長的歷史文化過程而形成的社會生活的地域性特點，以及不同地區的百姓關於『中國』的正統性觀念，如何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通過士大夫階層的關鍵性中介，在『國家』與『地方』的長期互動中得以形成和發生變化的」。²分區域深入探討地方具體人群的來歷以及「麻城縣孝感鄉」提法興起的時間及其形成與傳播過程，相信有利於達至區域社會研究的目的。筆者所討論的地點在四川西部的雅安市雨城區東北部的上里鎮和中里鎮，主要根據《楊氏宗譜》、宗支碑及其墓碑，討論這支楊氏宗族的世系及來源、「麻城縣孝感鄉」提法興起的時間和在楊氏宗族內部和其他後來姓氏人群中傳播的過程。

一、沿革及地理

雅州「洪武四年歸附，降司，仍為雅州，省嚴道縣入州，隸四川布政司，屬川南道」。³

據現存於上里鎮白馬泉寺的明代萬曆三十一年（1603）《四川雅州水東鄉上里天空寺□》⁴碑以及中里鎮的《楊氏宗譜》來看，現在雅安市雨城區的上里鎮、中里鎮及下里鎮在明代均屬「雅州水東鄉」管轄。乾隆初年，「水東鄉轄里十五，河北、包陳、七盤、上黃村、中黃村、下黃村、上里頭、上里二、上里三、上里場、中里頭、中里二、中里三、中里四、中里場、下里頭、下里二、下里三、下里四、下里場」。⁵直到民國，雅安縣城去中里場尚需翻越蓮花山，共55里，中里場向北15里至上里場，⁶向南15里至下里場。

上、中、下三里由北向南依次排列於四面大山之中，上里北面綿延的天臺山成為邛州和雅州的一個重要分界山脈，東面有羅繩山（名山崗），是水東鄉與名山縣分界的重要山脈，西面有蘆山崗，是水東鄉與蘆山縣分界的重要山脈，南面有險峻的「碧峰峽」，中間則散落著連綿不斷的、直徑300至400米不等的「饅頭山」。東西兩條大山系相距20里左右，它們像兩道又高又厚的城牆環繞著這片土地，饅頭山之間則是大小不一的平原與狹長平緩的坡地。發源於北面天臺山麓的白馬泉與發源於西面蘆山崗的黃茅溪，在上里五甲口會合，再往下流入隴西河，經過約40里平地的蜿蜒流淌，穿過曲折陡峭的峽口，流進青衣江，向東經洪雅縣，於嘉定（今樂山）與岷江會合，於敘州（今宜賓）匯入長江。

據現存於上里鎮白馬泉寺的明代弘治十八年（1505）《雅州羅繩白馬泉淵澤侯碑文》⁷記載，「雅安治東北里許地名羅繩」，明代人們已把這片土地叫作「羅繩」（亦作「羅純」），目前人們在稻田中源源不斷地挖掘出大量的烏木。民間普遍認為這片土地是沉了下去的，因此這片土地又被稱之為「羅沉」（亦作「羅城」）。因為南

北約40里，東西約20里，四面環山，民間口頭語又稱之為「羅繩沱」。

二、楊氏世系考

以筆者近三個月的田野調查情況來看，八甲楊氏是明以來水東鄉世系記錄最為清楚的一支，它的世系記錄如果正確，就可作為水東鄉歷史的重要參照時間序列，就可作為其他人群進入水東鄉的時間判斷的重要依據。對這支楊氏世系考證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即在於此。

（一）《楊氏宗譜》的編訂、抄錄及版本

《楊氏宗譜》現存於中里鎮建強村，這裏從明到清都為第八甲，楊氏世居其地，故曰「八甲楊」。《楊氏宗譜》⁸載：

前明萬曆十四年，廷富祖公錄宗譜一次

永曆十年十一月錄一次。按：明末清初永明王崇禎太子於順治三年丙戌即位，於肇慶府號永曆，至庚寅年十一月亡，在五年，所謂十年，年者比時蜀未投誠也。

本朝康熙十二年冬月廿五日秀翹公錄一次。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七月，文生朝經公錄一次。

雍正十年壬子秋八月，文生登賢公，名升庸，錄一次。

乾隆廿七年壬午中秋日，文生兆理公錄一次。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仲夏望日，楊魁、珣各錄一次。

嘉慶元年丙辰六月十九日，楊槐枝錄一次。

道光□□□年辛丑七月，文生楊正良，名含輝，錄一次。

道□□□□年丙午四月廿二日，廩生楊正遠，名立程，錄一次，添補至嘉字派矣。

咸□□□□月，文生楊榮光，名繩武，錄一次，楊國海錄一次。

同治十二年新正月，楊國仁錄一次。

咸豐六年丙辰三月廿八日，楊在榮錄一次。

光緒廿一年乙未暑月天貺節，楊嘉瑞在兄嘉升家錄一次。

同治十二年癸酉二月廿二日，楊國璠錄一次。

《楊氏宗譜》從明萬曆十四年（1586）開始，一共抄錄了十五年次。目前看到的《楊氏宗譜》的規模是由楊正遠名立程（號靖齋）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所編訂。《楊氏宗譜》現存三本抄錄本，一本為蟲蛀舊本，殘缺嚴重，估計是光緒二十一年抄錄本或光緒二十八年增訂抄本，一本是「民國二年癸丑春日看抄錄」本（即本文使用的版本），一本是1996年編訂本。

（二）楊廷富世系考

楊廷富作為《楊氏宗譜》的第一位抄錄者，其世系關係到以後的整個世系正誤，因此有必要對楊廷富以前的世系作一番考證。查《楊氏宗譜》，「始祖楊桂芳，時氏海娘，生文智即萬生、文斌即九生、文德即天生，一女招贅壽生，無考。萬生在上里廟下溝，錄於後。九生李氏，生發授，生楊榮、楊祖、楊明。天生黃氏，生永安。」從始祖楊桂芳以下到楊廷富及其一個兒子的世系整理如下：

始祖楊桂芳時氏海娘，生文斌即九生，生發授，生楊榮，生思恭文氏，生楊膳胥氏，生志綱高氏，生廷富王氏，生楊環。

《楊氏宗譜》載，楊思恭、楊膳、楊志綱及楊廷富「以上四代葬子孫橋，共一墳垣」。筆者在楊氏宗族墓地找到了楊志綱、楊廷富和楊環祖孫三代的墓碑（見圖一、二、三）。

乾隆二十二年（1757）給楊志綱及楊廷富重立的墓碑後面約30厘米處，各有一塊明代形制的墓碑。這些明代墓碑多半已被泥土掩埋，只留出上半截的正面部分，碑文大多磨滅不清，楊志

綱的原墓碑尚能看清「大明」二字。楊思恭及楊膳的墓碑則沒有找到，估計已在楊氏宗族墓地的泥土下面。據「本朝康熙十二年冬月廿五日秀翹公錄一次」，「秀翹公」即楊環墓碑上的祀男「翹」，墓碑雖未書「秀」字派行，但在《楊氏宗譜》裏則記載得很清楚。《楊氏宗譜》從楊廷富到其玄孫楊秀翹，抄錄了兩次，那麼他們這支的世系從始祖楊桂芳到楊廷富應該是最清楚的。從始祖楊桂芳到楊志綱為七代，到楊廷富為八代。九代孫楊環（1586-1673）身歷明清兩代，為八甲里長，這是「水東鄉八甲楊」名稱的來歷。

因《楊氏宗譜》「通譜單記九生祖公之後，十傳至秀字派同族兄弟十八人，以後分記秀字，十八房之裔族繁不及備載」。《楊氏宗譜》詳於「九生」一房，即楊桂芳到楊廷富一支，那麼楊桂芳到楊廷富的世系正確與否，能否找到其他旁證呢？《楊氏宗譜》對長子「萬生」一支的世系記載僅有如下記錄：「（月兒壩一支）萬生，興隆，福海，從良，安庸，尙祿，筠生，芝，秀恒，聯闊，方華，兆遠，鬱然，思順，仁孝，永安」。顯然，楊桂芳的長子「萬生」的世系不能單憑其次子「九生」後裔的《楊氏宗譜》的記錄作準，必須對「萬生」一支世系作考察，以印證次子「九生」後裔楊廷富世系。長子「萬生」遷居上里，今天上里鎮廟坪村楊氏宗族即其後人。筆者先前到廟坪村考察過「萬生」這支楊氏宗族的墓地，發現其墓地有多塊明代墓碑，本文引載了其中一塊內容最為完整的墓碑（見圖四）。

乾隆五十五年（1790）楊氏宗族在這塊墓地裏立有「楊汝俊」宗支碑（見圖五）。據「楊汝俊」宗支碑的代數來算，楊桂芳到楊景昌、楊景會為七代。《楊氏宗譜》中楊桂芳到楊志綱亦為七代。楊志綱的墓碑鐫刻於隆慶五年（1571），楊景□的墓碑鐫刻於隆慶四年（1570），這證明楊志綱與楊景□為同一時代之人，他們去世的時間僅相差一年。又據現存於上里鎮白馬泉寺的嘉靖十年（1531）《大明按古重修白馬靈泉梵剎碑記》⁹載「本鄉里正楊景茂撰首書」，「楊景茂」雖未在「楊汝俊」宗支碑上，但從「景」字輩來看，「楊景茂」與楊景□應是楊桂芳長房「萬

生」的同輩後裔。這證明，《楊氏宗譜》裏有關楊桂芳到楊廷富的世系是可信的。

（三）楊廷富以後歷次抄錄宗譜者世系考

《楊氏宗譜》主要由九代孫楊環這一支系的後人抄錄。譜系只寫至楊環，楊環之前的世系請見上文的「楊廷富世系考」。

如前文所載，《楊氏宗譜》的抄錄情況如下：

第二次，永曆十年（1655）十一月錄一次。無考。

第三次，本朝康熙十二年（1673）冬月廿五日，秀翹公錄一次。楊秀翹為第十代：「楊環生秀翹」。

第四次，康熙五十五年丙申（1716）七月，文生朝經公錄一次。楊朝經為第十一代：「楊環生秀翹，生朝經。」

第五次，雍正十年壬子（1732）秋八月，文生登賢公，名升庸，錄一次。楊登賢為第十二代：「楊環生秀翹，生朝經，生登賢。」

第六次，乾隆廿七年壬午（1762）中秋日，文生兆理公錄一次。楊兆理為第十三代：「楊環生秀翹，生朝緯，生登榮，生兆理。」

第七次，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仲夏望日，楊魁、珣各錄一次。楊魁為第十四代：「楊環生秀翹，生朝寅，生登甲，生曰杞，生楊魁。」

第八次，嘉慶元年丙辰（1796）六月十九日，楊槐枝錄一次。楊槐枝為第十五代：「楊桂芳生九生，生法授，生楊榮，生思敬，生萬珊，生楊敷，生廷茂，生守華，生秀升，生朝俊，生先芳，生萬鑑，生文貴，生槐枝。」

第九次，道光□□□年辛丑（1841）七月，文生楊正良，名含輝，錄一次。楊正良為第十五代：「楊環生秀翹，生朝緯，生登文，生曰珍，生楊尊，生正良。」

第十次，道□□□□年丙午（1846）四

月廿二日，廩生楊正遠，名立程，錄一次，添補至嘉字派矣。楊正遠第十五代：「楊環生秀翔，生朝緯，生登文，生曰珍，生楊相，生正元。」

第十一次，咸豐六年丙辰（1856）三月廿八日，楊在榮錄一次。楊在榮為第十六代：「楊環生秀翔，生朝綱，生登俊，生曰珩，生楊秀，生正義，生在榮。」

第十二次，咸□□□□月，文生楊榮光，名繩武，錄一次，楊國海錄一次。楊榮光無考。楊國海為第十七代：「楊環生秀翹，生朝寅，生登甲，生曰杞，生楊魁，生正璋，生元勳，生國海。」

第十三次，同治十二年（1873）新正月，楊國仁錄一次。楊國仁為第十七代：「楊環生秀翹，生朝寅，生登甲，生曰杞，生楊映，生正連，生在賢，生國仁。」

第十四次，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二月廿二日，楊國璠錄一次。楊國璠無考。

第十五次，光緒廿一年乙未（1895）暑月天貺節，楊嘉瑞在兄嘉升家錄一次。楊嘉瑞為第十八代：「楊桂芳生九生，生發授，生楊祖，生思義，生楊春，生志漢，生廷儉，生楊廂，生秀朝，生時俊，生登健，生曰林，生文生楊忠，生正，生在聯，生緯明，生加瑞。」

到乾隆時期，《楊氏宗譜》共被抄錄六次，分別在第八代（楊廷富）、第十代（楊秀翹）、第十一代（楊朝經）、第十二代（楊登賢）、第十三代（楊兆理）及第十四代（楊魁）。後五次抄錄宗譜之人，均是楊環的後代，其中楊桂芳至楊魁的世系很清晰，亦有墓碑等證據。嘉慶元年（1796）的《楊氏宗譜》由楊槐枝抄錄，他並非楊環的後代，並加進了「思敬」一支的詳細世系。道光以後，《楊氏宗譜》又由楊環後代抄錄，分別由第十五代（楊正良）、第十五代（楊正遠）、第十六代（楊

在榮）、第十七代（楊國海）及第十七代（楊國仁）抄錄。光緒年間，由「思義」一支第十八代楊嘉瑞抄錄。「思義」一支世系至遲在光緒年間亦加入到《楊氏宗譜》裏了。

三、「麻城縣孝感鄉」由碑入譜的過程

筆者在楊氏宗族墓地發現了《翰宇祖公墓志》¹⁰，該墓志的落款為「大明隆武丁亥孟冬蒙邑舉人欽考知州通家眷弟晏煒撰 功授閩劄都司僉書銜盟弟范應樂書」。該碑則是楊體富於道光五年（1825）六月重立。現抄錄墓碑文一段如下：

欽命督師閣部、加升遊擊團練、鎮撫名山縣事楊公、諱秀玉、號翰宇者，其先世楚人，避亂入蜀，卜居雅安水東鄉，公派為長，業創羅繩實家焉。

隆武為南明年號，丁亥年即順治四年（1647），當時清軍尚未進入雅州，水東鄉尚奉南明正朔，晏煒此時說楊秀玉「其先世楚人，避亂入蜀」，當為確實。

楊環身曆明清兩代，為八甲里長，其後代枝繁葉茂。乾隆四十七年（1782）二月二十日，楊氏第十七代玄孫楊仲元、楊榮春以及雅州府生員楊尚志等，立了一通宗支碑¹¹，其碑陰全文如下：

粵自

太祖桂芳原籍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苦竹扁人氏。明初升任嘉定，任滿於崇慶州白塔山入籍，後移居雅州水東鄉下黃村河北街龍門。後長入籍，故亦號曰「白塔云」。妻時海氏所生三子，長名萬生，於洪武四年移居羅城上里老漕溪口，以至於今四百餘年矣。其子孫蕃衍，支分派發別何止千戶，欲溯源而析其流，非書有載志，戶有譜牒，安能以家乘之大略，昭示來茲也哉。歲在壬寅宗長榮春垂念家門有志族譜，因其議勒碑自 太祖、高祖、尊祖以及遠孫，逐依刻石既命工請序於予。予曰：「由

太祖而上之，則淵源始於弘農；自太祖而下之，則統緒祥逮於近今。總自古初世口不及子孫蕃衍，然太祖視之，則皆子孫也，後之人庶得閱碑而瞭然在目。凡載志譜牒，由此而傳澤之，不斬宗法之，不失於後世也。是為序。

石司王現

名邑庠生一十七代玄孫楊奇偉撰

楊奇偉撰文提出「太祖桂芳原籍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苦竹扁人氏」，他很強調這一說法，認為「非書有載志，戶有譜牒，安能以家乘之大略，昭示來茲也哉」。查現存《楊氏宗譜》，並無這樣的記載。楊奇偉的這一說法並非來自《楊氏宗譜》，而是來自「書有載志」。乾隆四十七年（1782），這支楊氏宗族裏入學的讀書人開始強調太祖桂芳「明初升任嘉定」，這與「避亂入蜀」的說法有很大出入，這還意味著「原籍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與因官入川聯繫在一起，即與王朝正統性聯繫在一起。據筆者的田野調查來看，這是羅繩丞目前發現最早一個追溯祖籍為「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的例子。撰文者是來自羅繩山（名山崗）以東的名山縣的十七代孫庠生楊奇偉。

乾隆五十五年（1790），楊桂芳長子「萬生」一支又立一通宗支碑¹²，碑陰起頭即為「派祖來歷，湖廣麻城縣」。

嘉慶二十五年（1820），楊桂芳「萬生」這支刻了一道宗支木牌，掛於楊氏祠堂中。筆者見到了這道宗支木牌，其開頭為：「□□省黃州府麻城縣，州太守，恩任嘉定後署雅」。¹³

道光二十五年（1845）七月初八日，楊宗仕墓碑¹⁴豎立，這通墓碑碑陰刻了楊氏宗支世系並追溯楊氏宗族淵源。現摘錄追溯楊氏宗族淵源的文字如下：

我楊氏湖廣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苦竹堡人也。祖諱筠松，三國時武侯南征從軍入焉。有功，□楚，後為大邑縣太守，駐驛於三岔街。相傳數十餘代，迄唐宋之久世遠年，湮其序次，難以記錄。

與乾隆年間的宗支碑文比較，祖籍與地名有所出入之外，更重要的是，「庠生奇芳」突發異想地加入了一段「祖諱筠松」難以記錄」。其目的是很明顯的，即更加突出祖先因官入川的經歷。

道光二十六年（1846），楊立程編訂《楊氏宗譜》，於當年端午節前二日寫了《宗譜敘略》，有關祖籍追溯內容如下：

稽我始祖本係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水井灣苦竹堡人氏，諱曰筠松，精於風鑒，著作盛行宇內，乃當漢季崇昭烈皇帝出征南夷，由楚入蜀，尋以大功出守大邑，因家於岔街，延傳二十餘代。無奈劫難屢加，是以譜系難悉。考古能無憾乎。

這段追溯祖先的文字，在祖籍地的小地名上加入了「水井灣」，楊立程顯然繼承了楊奇芳的說法，並又增添了不少內容。「祖先」楊筠松獲得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後，楊立程就捨去了楊桂芳「明初升任嘉定」的說法。祖籍「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的說法與「始祖筠松」的說法第一次出現於《楊氏宗譜》。

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八代孫楊士元專門寫了《增訂族譜辨正序略議》，收錄於現存《楊氏宗譜》篇首。其全文如下：

族譜非等稗史傳奇，張冠李戴，烏有子虛，皆可任意杜撰為之，以其無關輕重是非得失也。序族譜則不然，必信而有徵，實而可據者，始敢筆於書而傳於後。庶使祖宗慰而孫子安也。曩見家乘一冊，道光中族老恩進士靖齋公者，設帳於吾鄉之梓潼觀，訓課餘閒訂成族譜一書，旁收博採，參互考訂，頗費精神。第撰譜序略托始於漢代而直祖筠松。余嘗讀而疑之，竊謂祖功宗德，前人有之，而後人不為表彰之，是怠忽而棄祖也；前人無之而後人強為附會之，是罔誣而冒宗也。我聞在昔原有舊本，

自靖齋集訂而後，族人皆去其舊，今不可得而觀矣。余謂孔聖刪書，斷自唐虞，以前洪荒存而弗論。與其遠取代遠年湮之筠松為祖，雖善而無征，何如近取由楚入蜀之桂芳為祖，則實而可據乎。夫釐清籍貫本文人分內事，余嘗遇同姓人輒詳細詢問之，有稱自昔土著為楊者，有稱近自外省遷來為楊者，有以羔羊而更為楊者，有以歐陽而變為楊者，甚至博物志云：「隴蜀昆連之野有古樹茂林，其中有人類自成部落。」由此觀之，姓字雖同，宗系迥別。使不考徵確實，則魯魚亥豕，千百世下其流弊紊淆，不知伊胡底也。靖齋公撰序末云，後有覽者勿以荒謬見咎。側聞當日修譜時，曾受外人多金，私納收入譜者，其事之有無今昔不得而知，然因其言足以見其志，讀其書可以想見其人。天下事每有彌縫甚工而反流露不及。覺者見議有詰余者曰：「子言固也。第求之前代，究當祖何人為是乎。」余曰：「籲此不可妄斷臆說也。子如欲覓真根源，則必赴湖北蹈黃州足履麻城孝感之故鄉，口訪里鄰族氏之遺老，或有真本實錄之流傳。及有古碣殘碑之志記，庶幾我族氏之真實不虛，其本原必有在於是。」族人莞爾作而謝曰：「謹受教。」

光緒之二十八年歲在壬寅菊月九日 裔孫
雅安縣學增廣生員儒齋士元撰

楊士元主要批評楊立程在處理「筠松為祖」的問題上有「冒宗」之嫌。光緒年間羅繩丞既「有稱自昔土著為楊者，有稱近自外省遷來為楊者，有以羔羊而更為楊者，有以歐陽而變為楊者」，混處於如此眾多的不同時期、不同來歷的同姓人群中，這種「冒宗」的做法，過猶不及，它甚至令楊氏宗族內部的成員懷疑祖先是否為楊桂芳。楊士元記錄他與同宗成員爭論祖先的話語顯示，他接受「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的說

法，並繼續納入宗譜。作為讀書人，雅安縣學增廣生員楊士元再次捍衛並推廣了祖籍出處地「湖廣黃州麻城孝感鄉」的觀念。楊士元所謂「有古碣殘碑之志記」，筆者通過尋訪上里、中里各姓宗族墓地和羅繩丞大小廟宇，並沒有發現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前「古碣殘碑」有關「湖廣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的記載。

綜合來看，這支楊氏宗族的祖先於元代中後期來自「楚」（湖廣）。乾隆四十七年（1782）名山庠生楊奇偉撰宗支碑文，開始聲稱來自「湖廣麻城縣孝感鄉」；乾隆五十五年（1790）楊氏三支眾立宗支碑，也開始聲稱來自「湖廣麻城縣」；嘉慶二十五年（1820）宗支木牌接受了楊奇偉的說法；道光二十五年（1846）楊奇芳撰楊仕宗墓碑碑陰的宗支碑文時沿襲了楊奇偉的這一說法；道光二十六年（1847）楊立程編訂《楊氏宗譜》時，把這一說法寫入《宗譜敘略》；光緒二十八年（1902）楊士元《增訂族譜辨正序略議》亦沿襲此說。楊氏宗族祖籍「湖廣麻城縣孝感鄉」由宗支碑入《楊氏宗譜》的過程，歷歷在目，這與僅憑《楊氏宗譜》而得出楊氏淵源來自「湖廣麻城縣孝感鄉」的結論，恰恰相反。

四、「麻城縣孝感鄉」祖籍傳說的擴散

（一）乾隆時期八甲楊氏入學¹⁵人數大增

據《楊氏宗譜》「登賢記」，清代一共有56名科舉入學之人。因書頁殘缺一名不知身份外，正榜一名，副榜一名，貢生三名，廩生四名，八名武生，文生38名。按代數計算，第十代一名，第十一代二名，第十二代二名，第十三代九名，第十四代二名，第十五代八名，第十六代五名，第十七代二名。其中還有25名不知具體代數，但都在「思恭」及「思敬」支系七代孫，即第十二代以後。

參照前文楊氏世系考的代數來看，抄錄宗譜的楊兆理為第十三代，時為乾隆二十七年，「登賢記」顯示，從第十三代開始，入學人數大增。查乾隆四年（1739）刊刻《雅州府志》，雅州府進士「國朝楊調鼎，郡人」¹⁶，武進士、武舉、副榜無楊姓，貢生「楊九疇，保縣訓導」¹⁷，監生

「楊琳」¹⁸，與八甲《楊氏宗譜》核對，這些人都不是水東鄉八甲楊氏。因此，可以判斷八甲楊氏科舉入學人數大增，是從乾隆時期開始。

這種現象至少可以作為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後楊氏宗族接連不斷豎立「宗支碑」和追溯祖籍的原因之一來考慮。

（二）咸豐末年「藍朝鼎之亂」的影響

吾蜀承平數十年矣。i i 突於咸豐九年九月滇匪李藍二逆竄擾川疆，筠連、慶符相繼失守，蔓延敘府，全川震動。i i 丹稜、蒲江、名山失守兩次，夾江、峨眉、雅安雖未失守，而賊臨城下，殺戮甚慘，焚掠尤多。¹⁹

咸豐十年三月，藍大順圍雅。大順名朝鼎，滇之無賴，與李短搭名永和，由滇販鴉片來蜀下南，同時嘯聚，以割髮辮為號，糾眾數萬，自高、珙二縣走上南，破蒲江，犯名山。²⁰

咸豐九年（1859）滇人藍朝鼎大股進入四川，主要溯岷江奔邛州、溯青衣江至雅州。²¹雅安縣城東北翻蓮花山55里到中里場，上里場向東翻過幾重羅繩山（名山崗）就到名山縣。《名山縣志》載：「蹇壽福，縣之節義民也。賣菸葉資生，小有積蓄。咸豐十年三月，滇逆竄境，縣民空城走遁，壽福於路旁泣阻親友毋紛紛遷逃致城不可守，皆不聽，越數日百丈潰防，兵民奔散」。²²各種證據表明，藍朝鼎及其人馬並沒有翻過羅繩山（名山崗）或者由蓮花山進入水東鄉。經年累月的地方動亂，幾重山之隔的水東鄉雖未直接造成人員大量流亡，但它並非世外桃源，其震動也很大。據上里韓氏光緒十四年（1888）「韓廷鎬」墓碑記載：「無何藍逆上竄，兄鈞倦於家務，議分爨」。²³這種動亂造成水東鄉人心惶惶，分家欲各保家產的情況應不只韓氏一家一姓。四川清初政府政策導向的「湖廣」移民很多，咸豐年間川西各地流民或加入滇人藍大順

及李永和的隊伍，或「土匪起者益眾，多冒藍李」²⁴，或自立旗號，成群結隊。這種局面致使清政府在四川面臨如何區分糧（良）民與匪黨的問題。一般百姓自稱從「湖廣」而來，至少可與「滇匪」劃清界限。在四川，這種「麻城縣孝感鄉」的祖籍追溯於咸豐九年（1859）以後顯得尤為重要。

（三）《隨身寶》祭文範文格式出現「湖廣麻城」

筆者在羅繩沔發現一部《隨身寶》（手抄本）²⁵，它主要是民間文人日常使用的各種範文格式彙集。當中的「祭鄉約文」提到「耶或此藍賊逆天，曲殺萬千，地獄作亂，冥王不安，召公去解散，地府得平安」，這部《隨身寶》可能產生於咸豐九年（1859）藍朝鼎之亂後不久。其中有一篇「清明祭文」，透露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其內容如下：

清明祭文

嗚呼，我祖有靈，大啟人文，護佑子孫，福壽康寧。猶憶當年，克儉克勤，興家治業，傳於後人，流芳百代，子孫綿綿。寒食佳節，共慶清明。念切本源，祭獻墳塋。九泉一奠，略表微忱。神若不昧，來格來臨。

i i

惟我先祖，本係楚人。始祖入川，樂業羅城，後世族繁，大啟人文。今有裔孫，又采新芹。沐恩報德，用獻牲豚。靈其有知，伏冀來臨。

i i

惟我祖籍湖廣麻城，始祖入川，諱曰○○，厥後族繁，子孫綿綿，克光前業，佑啟後人。呵護裔孫，○入贅門，念切本源，祭獻墳塋。靈若不昧，來格來歆。

據文中的「樂業羅城」判斷，這本書並不是從羅繩沔以外抄錄的，而是羅繩沔的文人自己創作的。這篇「清明祭文」是作為一個固定格式

出現的，我們似乎能看到「麻城縣孝感鄉」傳說傳播的內在機理。首先，文中圓圈的地方可以根據不同的姓氏，填上具體的始祖名字。其次，文中「又采新芹」，即為「采芹」一詞的演化，與「黌門」均指考中庠生（俗稱秀才），成了縣學或府學的生員。²⁶可見，從這篇範文的使用條件來講，能配得上這種格式的清明祭文的宗支，還必須是有宗支成員科舉考試中入學。再次，因祖籍湖廣麻城的始祖呵護裔孫，其後人才能入學，祖籍湖廣麻城與科舉成功有著必然聯繫。這篇「清明祭文」範文的出現，意味著「湖廣麻城」說法的「群眾基礎」應該很好，否則這樣的祭文就沒有市場了。這使我們明顯感覺到，那些宣稱「祖籍湖廣麻城」的人群在羅繩沱的科舉考試中有著現實優勢，科舉考試中入學的宗支人群，才有資格用這種格式的清明祭文。雖然我們無法探明到底是掌握民間文本的讀書人傳播了和規定了「麻城縣孝感鄉」傳說，還是「麻城縣孝感鄉」傳說規定了民間文本的形成與傳播過程。但科舉考試與鄉間的讀書寫字之人，在水東鄉「祖籍湖廣麻城」的價值導向與輿論導向上起到關鍵作用，這一過程是非常清楚的。

（四）同治以來水東鄉其他姓氏追溯祖籍現象增多

自「（咸豐）十一年駱公秉章移節來川督軍務，大破賊於綿州」²⁷之後，四川各州縣逐漸平靜。據筆者的田野調查來看，水東鄉同治以來其他姓氏追溯祖籍的現象相對增多。

許氏目前居住於上里許家灣，約有400人左右。

同治二年（1863），「邑貢生楊福基」給「許母楊老太君」題寫墓碑²⁸，並撰寫墓碑碑陰：「即如我始祖許大材何氏周氏，本湖廣荊州府麻城縣孝感鄉苦竹扁人氏，同母張氏遷居四川洪雅縣白塔山居住，後又遷居雅安縣水東鄉羅城上里玉皇廟許家灣創業，始有我二代祖許正賢李氏i i」。筆者找到了許正賢的墓碑，²⁹其時間為「皇明永曆甲午十二月二十一日」。顯然，許氏從洪雅縣遷居水東鄉羅城上里玉皇廟的時間，是在明末。

黃氏目前居住在上里箭杆林村，約有400人左右。

同治十年（1871），邑貢生楊奇芳為黃文清題寫墓碑文，³⁰而墓碑陰的「墓志分晰七房總序」由雅州府吏員黃永昌所撰。其文曰：「本屬湖廣五昌府麻城縣孝感鄉，遷流古郡，托業漢嘉。數十年間，分移瀑水i i創者黃公諱存瑞馮氏，其先居蒲江騎羊寺，二世祖公文朝盧氏馮氏，係家鄉人也，移居雅邑箭桿林，生世祖啓根胥氏、啓應師氏i i」。考之世系代數，從黃存瑞到黃文清，共九代，與同治十二年（1873）楊氏第十七代孫楊國仁比較可知，黃氏是明末清初從蒲江搬到箭杆林的。墓碑顯示至遲同治年間黃氏與楊氏家族有了姻親關係，我們無法得知黃永昌在撰寫墓志序時是否請教過楊奇芳，根據楊奇芳撰寫楊宗仕碑文，以及《隨身寶》所反映出來的入學士子的「麻城縣孝感鄉」優越感來看，作為雅州府吏員的黃永昌，當不例外地會引用「麻城縣孝感鄉」籍貫，刻之於石，流之久遠。

任氏目前居住於上里四家村任家溝，約有700人左右。

光緒二十年（1894），「本里太學生內弟藍炳林」給任文釗題墓碑³¹，侄孫藍映奎述書墓碑陰之任氏世系：「始祖諱都，係湖廣麻城縣孝感鄉土橋溝慈竹岩人氏，明永樂年避賊入川南雅安縣慕義鄉子林沙壩頭，遷河北街娶妣氏朱，後又遷蘆山縣七元鄉，二世祖諱珖，都公之子，有功於國，官拜一等，三世祖諱碧宗氏朱，珖公之次子，後仍遷雅邑羅繩方家扁i i」。從遷入羅繩的三世任碧宗算起，到任文釗，共九代，而且任氏並無清代乾隆以前的墓或碑，與光緒二十一年（1895）楊氏第十八代孫楊嘉瑞比較，可以斷定任碧宗是明末清初從蘆山縣搬到水東鄉的。

景氏目前居住於上里共和村景家壩，約有400人左右。

民國三十年（1941）所立宗支碑³²，他們的宗支碑立於一片稻田中的土包上，四面已經被開墾成水田，宗支碑前不到20厘米就是水田。碑陰文（省略號為碑文被泥土掩埋部分，無法辨識）：「蓋以根枝深，故其葉茂，源之遠，故其

流長，惟吾創業鼻祖景廷倉，原湖廣生長人氏，自來生疆邑入羅城景壩住居有年矣。茲者族大繁冗，如瓜瓞之綿綿，而子孫眾多，若螽斯之聲」。查景氏「袱簿子」，目前景氏第十三代還有人在世，詢問景氏後人，據他們所知清代景家並沒有幾人入學。以此推想寫碑文之人並非不知道「湖廣麻城縣孝感鄉」，而是不敢把「麻城縣孝感鄉」寫下去。

當然，並非所有水東鄉的姓氏都宣稱來自「麻城縣孝感鄉」，「麻城縣孝感鄉」傳說很難侵入那些通過科舉產生讀書人且保有宗譜的姓氏的宗譜。如中里胥氏³³（本籍浙江省嚴州府桐廬縣烏石灘胥口人氏，明代遷來）、上里楊氏³⁴（嘉定府夾江縣牛仙鄉九皇廟，明代遷來）、上里韓氏³⁵（祖籍陝涇花池頭余家村，康熙三十二年遷來）。然而，「麻城縣孝感鄉」的傳說，卻很容易通過撰寫碑文者滲透到他們的碑文裏。上里楊氏後人楊枝玉於道光三十年（1850）立墓碑，其碑陰文亦由「雅州府學廩生侄楊福基」撰，碑文開頭如下：「本郡上里生長人也，始祖銀爐，由廣入川，自明及清，凡十餘代，相傳至余大父，根深枝茂，水香坪世譜，志之詳矣。」³⁶筆者亦到上里水香坪抄錄了其「世譜」，全文並無「由廣入川」字樣。（這支楊氏明代來上里，為目前上里人口最多之姓氏，本文無法在此展開討論。）水東鄉文人並非如「現代學術體制規範」下的「學者」對「抄襲」與「侵權」如此較真，這種由「楚」而「廣」，而「湖廣」，由「湖廣」而變為「湖廣麻城」，再至「湖廣麻城縣孝感鄉」，更至「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水井灣苦竹堡」，甚至「湖廣五昌府麻城縣孝感鄉」的趨勢，似可預料。有宗譜之大家族尤如此，其他小姓人群面對「麻城縣孝感鄉」的滲透，其結果可想而知。

筆者有一次從上里坐車到中里，在車上與一位名年約五十多歲的上里楊氏後裔交談，以下是筆者整理後的記錄：

在車上，我遇到一位名叫楊思耀的人。
他開了一家客棧。他共有八個兄弟，他

是老七。他的父親叫楊文皓，有六弟兄，他父親排行老五。他的大哥楊思光八十多歲了，就是馬路邊大水車正對面的那戶人家。楊思華的父親與楊文皓是親兄弟。現在他們八兄弟發下來的人口已經有一百六十餘人，有五、六個在成都買房子了。楊思耀說，他們一共有28個字輩，上14個字輩為：「在正通光昌俊秀，明文思安顯忠佑。」下14個字輩他沒能背下來，他說他大哥知道。「我們是正宗楊六郎的後代。」老人在的時候說過，他們是湖廣麻城孝感鄉的，是從那裏搬過來的。後來楊思全又把最後七個字輩想起來了：「永遠發達萬世興。」³⁷

（編者註：此段引文之人名最後一字全為化名，以存私隱。）

五、結論

正是有了八甲楊氏後人名山縣庠生楊奇偉、貢生楊奇芳、上里楊氏後人雅州府學廩生楊福基這樣的科舉入學之人，他們在鄉村生活中通過撰寫碑文與題寫碑文的方式，把「麻城縣孝感鄉」的觀念普及於水東鄉。水東鄉的讀書人已基本認同祖籍能具體到「麻城縣孝感鄉」是具有優越感的，賦予某姓氏「麻城縣孝感鄉」的祖籍，即表明該姓氏科舉入學有人。通過科舉入學的讀書人家族，則是與清王朝正統性保持高度一致的人群。在水東鄉，「麻城縣孝感鄉」即意味著清王朝對積極參與科舉考試的人群的高度評價，又是這些科舉考試入學人群對清王朝賦予他們「士」的身份以及權力的一種炫耀。

「咸豐九年九月滇匪李藍二逆竄擾川疆」，至咸豐十一年（1861）漸次平定。這段時期對四川清初從湖廣而來的百姓來說，他們需要重申祖籍「湖廣」，以顯示與清王朝的密切關係。水東鄉自同治以來，各姓氏族群追溯祖籍為「湖廣麻城縣孝感鄉」的情況相對增多，即為明例。那些科舉不利的讀書人，可能編寫或抄錄諸如「隨身寶」之類的「範文本本」，出於謀生糊口的初

衷使用於水東鄉各種禮儀場合。「清明祭文」中對能夠入學姓氏的讚揚，可見使用者對「湖廣麻城」的認可。沒有宗譜且祖籍沒有具體到「孝感縣麻城鄉」的人群，在水東鄉則是科舉不力的姓氏群體，其人數相對於楊氏宗族來說，也少了很多。那些沒有士子入學的姓氏人群，無從立碑，「麻城縣孝感鄉」的「祖籍」亦無處生根。目前許氏、黃氏、任氏及景氏都沒有宗譜，他們使用一種叫做「祔簿子」的世系冊子來代替宗譜。將來這些姓氏如要編寫宗譜，把祖籍「麻城縣孝感鄉」入譜，有可能將與八甲《楊氏宗譜》經歷同一過程。

「麻城縣孝感鄉」，已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清代的水東鄉逐漸擴散。明代世居其地的八甲楊氏，自乾隆以來科舉入學人數漸多（與上里楊

氏的情況相似），清初外來人口逐漸增多，咸豐末年川西動亂，這三個過程推動了這種擴散。水東鄉入學士子在鄉村裏通過寫碑訂譜的方式，樹立自己的優越感，並使不同時期來自不同地方的人群，在水東鄉逐漸接受祖籍「麻城縣孝感鄉」的觀念。在水東鄉接受「麻城縣孝感鄉」的祖籍傳說，也就意味著接受清王朝的統治（祖籍並非「麻城縣孝感鄉」的人群又有另一些說法，然而他們的說法無法普及）。讀書人在這一過程中，加強了水東鄉人對清王朝正統認可的潛意識。「麻城縣孝感鄉」傳說的普及，逐漸成為清王朝在人員遷徙流動極大的四川確立正統統治地位的標誌之一。這可能就是為什麼在四川很多地方均有「麻城縣孝感鄉」傳說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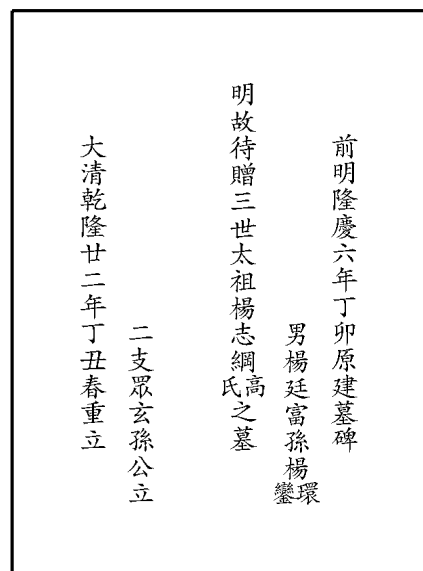
註釋

- ¹ 任乃強，〈張獻忠屠蜀辨〉，《川大史學·任乃強卷》（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原文發表於1947年《社會月刊》；胡昭曦，〈張獻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廣填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孫曉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陳世松，〈大遷徙：湖廣填四川歷史解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 ² 陳春聲，〈歷史的內在脈絡與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史學月刊》，2004年，第8期，頁9。
- ³ 熊相纂修，《四川志》（正德刊刻嘉靖增補本），卷22，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善本。
- ⁴ 2008年12月26日上里鎮白馬村抄錄並拍照。
- ⁵ 曹綸彬、曹掄翰攢輯，《雅州府志》（乾隆四年刊），卷3，〈鄉里〉，收入《中國地方誌叢書西部地方第28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頁72。
- ⁶ 余良選等總纂，《雅安縣志》（民國十七年）卷一，〈道路〉，收入《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漢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第94冊，頁303。

- ⁷ 2008年12月26日於上里鎮白馬村抄錄並拍照。
- ⁸ 2009年1月9日於中里鎮建強村拍照。
- ⁹ 2008年12月26日於上里鎮白馬村抄錄並拍照。
- ¹⁰ 2008年12月28日於上里鎮廟坪村抄錄並拍照。
- ¹¹ 2009年2月13日於上里鎮治安村抄錄並拍照。
- ¹² 2008年12月29日於上里鎮廟坪村抄錄並拍照。
- ¹³ 2008年12月29日於上里鎮廟坪村抄錄並拍照。
- ¹⁴ 2008年12月29日於上里鎮廟坪村抄錄並拍照。
- ¹⁵ 清代科舉相關制度請參見商衍鎰，《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 ¹⁶ 曹綸彬、曹掄翰攢輯，《雅州府志》（乾隆四年刊），卷9，〈選舉〉，頁213。
- ¹⁷ 曹綸彬、曹掄翰攢輯，《雅州府志》（乾隆四年刊），卷9，〈選舉〉，頁214。
- ¹⁸ 曹綸彬、曹掄翰攢輯，《雅州府志》（乾隆四年刊），卷9，〈選舉〉，頁215。
- ¹⁹ 長寧教諭鄧敏修，《防堵記》，《洪雅縣志》卷7，〈藝文〉，收入《中國地方誌集成·四川府縣誌輯38》（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頁581-583。
- ²⁰ 余良選等總纂，《雅安縣志》（民國十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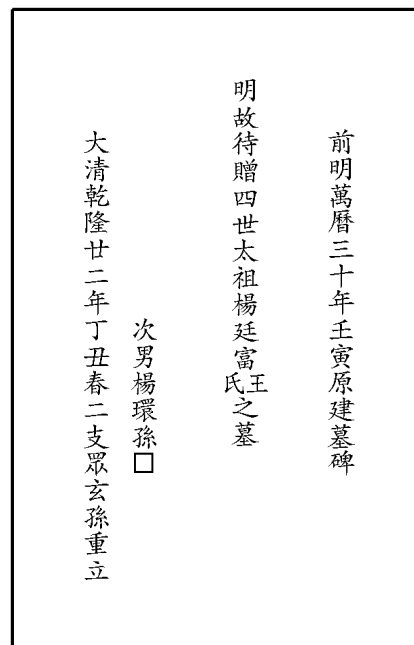
- 卷4，〈變亂志〉第九，「滇匪藍大順之亂」，收入《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漢文版）》第94冊，頁353。
- ²¹ 相關研究參見艾小惠，〈太平天國革命時期藍朝鼎李永和農民起義〉，《史學月刊》，1956年，第4期。
- ²² 趙懿等修纂，《名山縣志》（光緒十八年刻），卷13，〈列傳二〉，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 ²³ 2008年12月30日於上里鎮四家村抄錄並拍照。
- ²⁴ 祝介，〈蜀亂述聞〉，載四川大學圖書館編，《中國野史集成》42（成都：巴蜀書社，1993），頁488。
- ²⁵ 2009年1月15日於中里鎮鄭灣村拍照。
- ²⁶ 商衍鑒，《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頁27。
- ²⁷ 張驥修、曾學傳等纂，《溫江縣志》卷六，〈兵事〉，收入《中國地方誌集成·四川府縣誌輯八》，頁448。
- ²⁸ 2009年2月8日於上里鎮白馬村抄錄並拍照。
- ²⁹ 2009年2月8日於上里鎮白馬村抄錄並拍照。
- ³⁰ 2008年12月25日於上里鎮箭杆林村抄錄並拍照。
- ³¹ 2009年1月3日於上里鎮四家村抄錄並拍照。
- ³² 2009年1月9日於上里鎮共和村抄錄並拍照。
- ³³ 2009年1月12日於中里鎮鄭灣村拍照。
- ³⁴ 2008年12月19日於上里鎮四家村拍照。
- ³⁵ 2008年12月17日於上里鎮四家村拍照。
- ³⁶ 2008年12月18日於上里鎮五家村抄錄並拍照。
- ³⁷ 2008年12月21日於上里鎮調研之筆記。

圖一：楊志綱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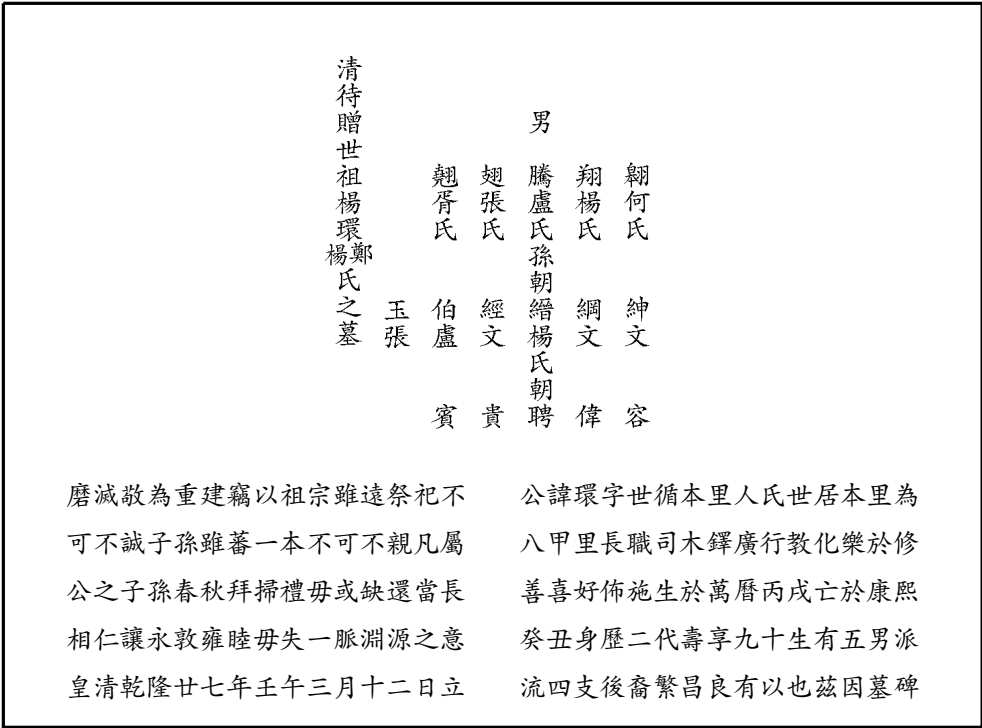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筆者於2009年2月17日在中里鎮建強村抄錄並拍照。）

圖二：楊廷富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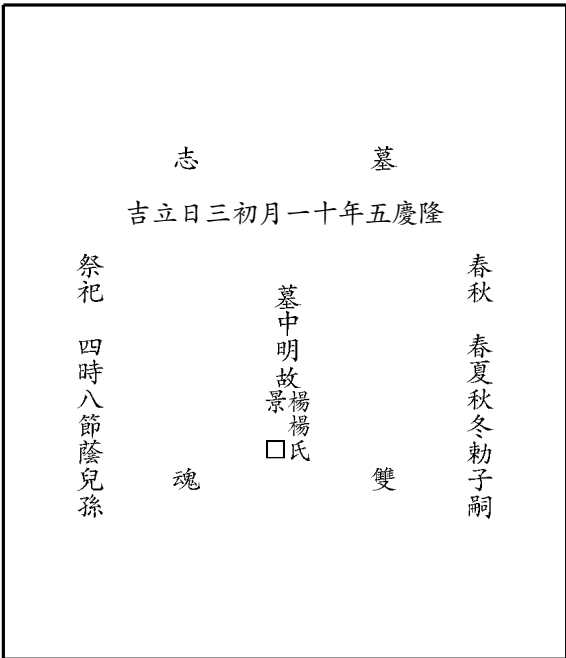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筆者於2009年2月17日在中里鎮建強村抄錄並拍照。）

圖三：楊環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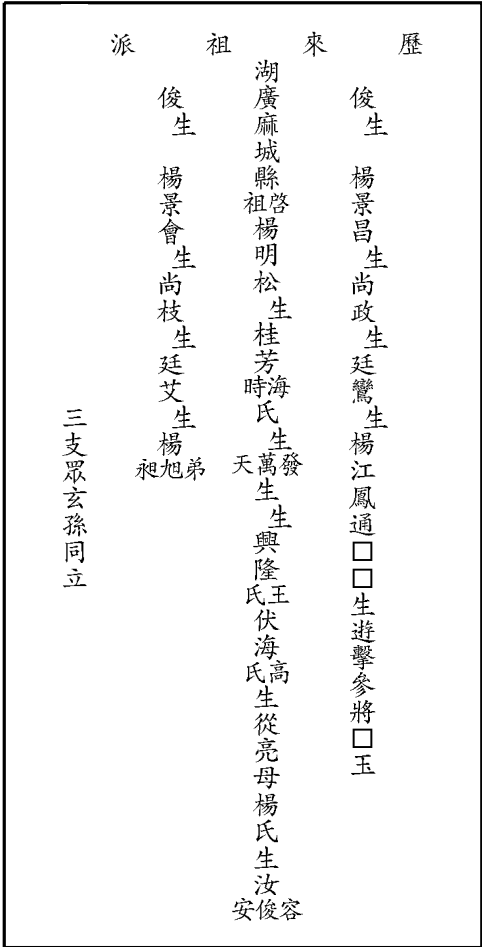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筆者於2009年2月17日在中里鎮建強村抄錄並拍照。）

圖四：楊氏宗族「萬生」支系墓地中的其中一塊
明代墓碑



（資料來源：筆者於2008年12月29日在上里鎮廟圪村抄錄並拍照。）

圖五：楊汝俊宗支碑



（資料來源：筆者於2008年12月29日在上里鎮廟圪村抄錄並拍照。）

道教儀式與民俗文化 ——對江西省吉安縣侯氏家族「喊船」儀式的考察

黃天娥
中山大學歷史系

傳統社會十分盛行瘟神及疫鬼的傳說，因而驅瘟禳災，祈求平安的儀式也很繁複。其中，以「送船」方式作為驅瘟禳災的儀式，在南方各省均能見到。如湖北孝感一帶的「打花鼓送瘟船」，廣東陽江一帶的「遣花船」，四川合州的「送瘟船」，廈門和臺灣的「送王船」等儀式，均以「船」作為「法器」，驅除災難，祈求平安。位於贛江中游的江西吉安縣曾經盛行一種稱之為「喊船」的儀式，和上述「送船」活動，有異曲同工之處。由於不同的文化傳統、地理條件、村落組成及經濟實力，縣境內的「喊船」儀式的具體過程也有差異。但是儀式的結構基本上相同，都是通過「接船畫」——「接神」，以收集村落中污穢，再隨著「送神」——「燒船畫」，達到潔淨社區與祈求平安的目的。另外，在儀式中所出現的群體幾乎一致：俗世群體——村落成員，是儀式主要的參與者，他們的親朋好友在儀式中扮演祝福者和觀眾的角色，儀式專家——天師道道士，則在儀式過程中擔任關鍵角色，而村中眾神則是神界的參與者；儀式表現為民俗化的道教傳統；儀式至少有兩個意義，其中是村落內部集體性的禳災祈福活動，其二是儀式為社區提供新春社交慶典場域。

吉安縣的「喊船」儀式在當代基本上已經停止了，但是還有一些村落保留了相關的文本資料。筆者在吉安縣橫江鎮馮先生手中看到了該鎮侯家村「喊船」儀式文本¹，今年6月28日，在該村村委會幹部的帶領下去侯家訪問，主要的訪談對象是均已年過80的侯氏夫婦²，筆者根據侯家的儀式文本和田野訪談資料對喊船儀式做了些考察。

侯家村位於橫江渡東五公里的西龍山南麓丘陵之中。元朝時，侯何泰由豐城各村侯家遷徙建村。³在明清屬於儒林鄉十六都，民國屬第二區橫

江鄉，現在為橫江鎮鳳凰村委會所轄。侯家在百餘年前有小河流經本村後蜿蜒注入禾水，禾水是贛江在吉安縣的六大支流之一。後來，這條小河流改道，殘留下來的淺淺的河床及一些小碼頭，仿佛還能證明這段歷史。侯家為單姓村，宗族組織本村最重要的社會組織，老人們稱有五房，在解放初期約有50戶。據說晚清時期戶數更多，可能有80至90戶，這種變化是因為30年代內戰的原因，導致了侯家戶數銳減，實際上四房和五房完全滅絕了。附近的鋪前村和侯家戶數相當，其餘的村落都是只有十來戶。

侯家人稱「喊船」為「接大神」，或稱為「鬧元宵」。對於「喊船」儀式最早開始的時間，老人們都無法回答，至於「喊船」的來歷，侯道達老人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喊船」儀式的由來

傳說張天師法力無邊，民間很多人都崇拜他，這事傳到了皇帝耳裏，皇帝不服，想試探張天師的本領，於是派人召見張天師。皇帝事先派了幾個大臣拿著各種樂器藏在宮殿的地下室裡，不停地吹拉彈唱，連地面上都能清楚聽到他們的喧鬧聲。當張天師來到宮殿，皇帝立刻問天師，是什麼人在什麼地方喧鬧，如何才能使宮殿恢復平靜。天師回覆皇帝說，他知道什麼人在什麼地方作怪，也知道如何整治這些人，但是，懇求皇帝無論出現什麼後果都不要責怪他。皇帝答應了，天師立刻要了一杯水，撒到宮殿的地上，果然喧鬧聲頓時停止了。當皇帝命人到地下室查看時，發現那些大臣都被淹死了。皇帝很佩服張天師，沒有為難他就讓他走了。不久之後，皇帝每晚都做噩夢，夢見那些大臣的鬼魂來找他並責怪他。皇帝沒有辦法，唯有派人請張天師來解決他

的麻煩。張天師提出送他們的鬼魂到紅門（意為大戶人家）去托生。可是那些鬼魂看到了祠堂的大紅門，便去了祠堂，錯過了時機，沒有辦法超生，於是他們天天在村裏鬧，令村民不得安生。村民請張天師幫忙，張天師提出在正月熱熱鬧鬧地把他們送走，就可以避災消禍，這儀式就是「喊船」。

二、「喊船」儀式的過程

根據侯氏夫婦的講述，「喊船」的過程比較複雜，具體過程可以分為以下幾個環節：

（一）接神前的準備

準備工作由宗族成員和道士分別進行。

宗族確定頭人。「喊船」儀式是從接神那一刻開始的，到完成送神儀式後，儀式才算結束。每條村落接神送神的日子，都是比較固定的，一旦把神接回去就要日供奉，夜夜喊船。侯家接神的日子是正月十一，送神的日子是正月十六，共五天，儀式所需要費用由輪值的頭人負擔，一般都不會動用宗族公產。

頭人一職由房份內的成員輪值。⁴侯家有五房，每房以戶為單位輪值做頭人，每年總計五個頭人，一人負責一夜儀式。30年代以後，由於四、五房已經沒有人戶，就由宗族公產負擔兩天儀式所需費用，而舉行儀式的日數仍舊是五天。

頭人在新年前就要準備好各種「喊船」時所需要的東西，其中主要包括鞭炮、蠟燭、紙錢及香油，同時還要準備一些食物，如南瓜、芋頭等用來煮成羹，給大家作宵夜，也可以準備熟豆子或者果品，分給大家吃。

道士預備船畫。「神」是從道士那裏「接」過來的，每個村落都有自己固定的道士，或者說，道士及他們的傳人世代負責某某村落的「喊船」儀式，他們和村落的關係稱之為「行（heng）世主」。「大神」其實是一張船畫，這些船畫是用道士家藏的木刻版印刷而成的。臨近新年，道士們根據自己所要「行」的村落數量，提前印製好船畫。船畫長約三米，寬約二米，上面畫了各種大小不一的船隻，船上面旌旗飄揚，船中站立

著許多官員模樣的人物。船畫上下都有軸子，以便於固定。住在距離侯家五、六里石塘邊村的蕭姓道士和侯家保持著世主關係，年年被侯家延請回村舉行這一儀式。

（二）接神

正月十一早上，接神儀式正式開始，侯家需要派出一支隊伍去道士家。這支隊伍由族長、房長、士紳及頭人組成，一般不超過八人。他們一早起來就直奔道士家，道士亦一早準備了一些小點心招待侯家人。隨後，道士便把已經預備好的船畫送給他們。他們便抬著船畫回村，徑直抬到侯氏宗祠——敘倫堂。敘倫堂是一座四進的建築，門前有兩座大石獅，座北朝南，何時所建，已經難以考察。祠堂的後寢，為第四進，供奉了歷代侯氏祖先牌位；第三進中右側供奉了康老爺，首進大門的兩側供奉著村民稱之為「娘娘菩薩」的菩薩和福主菩薩（當地人也稱之為「南平菩薩」）。

（三）安神與祭祀

到了祠堂，人們把畫像供奉在祠堂第三進的左面牆壁上。道士隨同接神隊伍來到村裏，在神像前設香案，安神位，完成後隨即就離去。村落各戶從這一天起，每天派男人（沒有男人的家戶，女人也被允許派作代表）帶著三牲等到船畫前祭拜。同時，也給祠堂內的康王菩薩、福主菩薩及娘娘菩薩上香。

（四）唱船

正月十一晚，八、九點左右開始「唱船」。這段儀式沒有主持人，道士也不在場，由侯氏族長選出的四個識文斷字的中青年人負責。他們坐在畫像前的凳子上，兩人共拿一本「船譜」，也即本文所指的儀式文本，分成兩組，準備唱船歌。上文提及的侯先生就曾經連續幾年被族長選為負責唱船歌的人，根據他的講述，那些船歌並不是出自道士之手，而是前代村裏的文人所作。船歌世代相傳，因而村中不識字的村民也能吟唱部分的唱詞。由五、六人組成的鼓樂隊也在同一

時間作準備，等龍燈舞動之後，鼓樂大作，「唱船」儀式正式開始。

當鑼鼓聲停下，他們首先唱「參神文」，以下是侯家的「參神文」：

見兒郎停鑼息鼓，吾參見⁵天符都天總管金容元帥大帝，參見地符副帥魔王法主匡阜先生，參見慈悲勸善大士，參見十二年王十二月將，參見七十二侯二十四炁，參見二十五種三十六敕，參見女瘟部屬逍遙元君，參見長生福主萬億靈通，參見龍船上兒郎，參見渡頭船上諸神，參見搖旗打鬧擊鼓鳴鑼嘍哮大神，參見競渡一郎，得勝兒郎，咆哮三郎，參見開江引水把舵放船，參見船頭大王，船尾小王，參見河泊水官，岸頭土地，參見一河兩岸護送神祇，參見屈原相公，參見押瘟祀典康王，參見設賽酒兒郎，參見疹子麻痘傷寒咳嗽四者，參見四季四孟四仲諸神，參見百谷祖主神農炎帝后稷尊神，參見天符部下，百百萬該鬼兵，參見吉安府城隍郡主，參見廬陵縣城隍大王，參見本祀開天帝母娘娘，參見仙本坊福主南平大王，參見家祀聖順忠列康王，參見下壇轉事五營兵馬，參見看生養育利市官，參見本境五土社令真神，參見門首土地，參見侯氏門中先亡魂身，參見詞人所祀九天東廚司命府君，參見上元會中無邊列神，兒郎所在船舫，標名不盡，無量靈通，具有金石保，尚穀堂，當屆接過設賽頭人侯某某 某某 等茲屆上元令節，照依常規，彩畫龍舟一江，迎引神船，到於祠庭，點炷香燈，聚集兒郎，嘍哮一五宵未曾圓滿，願保家合團（全家）⁶清吉，人口安康，官非消除，口舌埋藏，諸橫杜殄，營某吉昌，書聲振拔，文明烈彰，耕作豐盈，養育興旺，凡諸未刊，悉賴兒郎雙槳鼓子響咚咚，扯轉龍頭遇順風，諸神努力爭奪錦，齊

唱凱歌歸龍宮。兒郎來時香花啟請，去時馬糧奉送，更深夜晚，不敢久延於諸神，端坐船舫，留駕暫駐於祠庭，鳴鑼擊鼓樂豐稔，管取兒郎大得勝。兒郎元宵已過，聖駕難留，事有初終，理宜攀送，兒郎一曲過一曲，莫把花槳指人屋，一灣過一灣，莫把花槳指人間，鄉團所有為崇鬼，盡皆捉拿上船，行務祈老安少懷，災消福長，鼃鼓喧喧振地，喊哨赫赫驚天，離鄉村之冷淡，歸落浦之繁華，見兒郎收拾葫蘆、擔杖，牢把梢柁棹橈，傳此馬糧送行出水 請起諸神齊上馬，一篙徑到洛陽洲。

參神之後，四人開始齊聲唱「船歌」，首先是唱「木根源」：

唱起來時知起來，唱起江邊楊柳栽。楊柳年年換新葉，老條去了嫩條來。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皇帝一朝人。甘羅十二為丞相，太公八十遇文王。當今皇帝壽萬歲，一統山河置上元。萬年軍州七千縣，百萬四千草市場。唱歌要知船出處，斫木要知木根源。供養公婆要知祖，糠頭灸火要知煙。有錢做客要知路，擔鋤運水要知源。吃茶要知茶出處，吃酒要知酒根源。好茶出在高山嶺，好酒出在落隴田。茶爭先時酒爭先，茶酒相輪要相連。客人來往茶爭先，茶湯吃了酒來傳，三杯酒後來商議，從頭至尾說根源。當初何人至競渡，當初何人置紙船。當初何人置端午，當初何人至上元。屈原相公置競渡，後殿夫人置紙船。三官大帝置端午，岸頭土地置上元。屈原相公一百口，九十九口不安然。千般吃藥吃不效，萬般作福不安然。相公夜來得一夢，夢見江邊紙掛船。後殿夫人得一夢，夢見江邊紙掛船。便請師人來解夢，此夢要造大王船。便

請師人來許願，許願打造大王船。
許下競渡十二隻，許下紙船萬萬千。競
渡將來長江走，紙船火化上青天。
自從今日許願後，一家大小得安然。安
樂無爭去買木，買木打造大王船。
眾圍父老來商議，各州府縣說根源。尋
得一根沉香木，生在五湖四海邊。
細時生得竹樹大，如今長大尾青天。上
下客人來過往，卻來紙上拋紙錢。
東有一枝遮紅日，南有一枝遮南煙，西
有一枝遮佛國，北有一枝起風寒。
上有一枝青天去，下有根腳入黃泉。烏
鴉白鳥不敢棲，鳳凰來棲繞成團。
此樹生得神通大，一樹儘是白蛇纏。前
人擔斧不敢斫，萬人擔斧不向前。
差下軍兵去采斫，軍兵擔斧便向前。小
斧三下斫不入，大斧三下血連天。
眾圍父老來商議，買得燒紙告皇天。告
得皇天有感應，雷公霹靂雨連天。
四月八日狂風起，打落一枝在江邊。小
水推來投大水，大水推來王廟前。
此樹原來不憤死，卻來水上歇三年。河
伯水官來看管，岸頭土地夜不眠。
競渡三郎飛馬過，說道此樹好造船。眾
圍父老來商議，裝車絞上王廟前。
飛馬揚州請大匠，七日七夜馬蹄傳。揚
州卻無好大匠，請得張良及魯班。
張良先到南廳坐，茶湯吃了酒來傳。還
你現錢三百貫，綾羅匹緞不算錢。
張良聽得如此語，擔起斧頭便向前。張
良先到不下墨，魯班後到使線牽。
便借凹床來凹木，木床凹起在半天。便
請二人來鋸木，一張大鋸兩人牽。
上有一人丁字步，下有一人口向天。上
牽牽時下牽牽，鋸開木頭歸兩邊。
界得大板三百片，界得小板萬萬千。一
下斧頭頭上起，二下斧頭到尾邊。
二十四人齊下斧，斫起木皮飛半天。大
板將來造船底，小板將來造船舷。
釘起船頭高百尺，釘起船尾在半天。打

造神船得已了，不曾打艚不成船。
打艚卻要油灰艚，油灰卻要苧麻纏。打
艚神船得已了，不曾彩畫不成船。
便寫黃榜廟前掛，只要處師來畫船。廟
前掛了三日榜，二人揭榜來畫船。
處師一到南廳坐，茶湯吃了酒來傳。三
杯酒後來商議，若要畫船還幾錢。
還你現錢三百貫，手巾利市不算錢。處
師聽得如此語，擔起筆頭便向前。
處師原是兩兄弟，齊下筆頭便畫船。落
筆畫龍龍獻爪，落筆畫虎虎生亞。
左畫青龍右畫虎，牛頭夜叉歸兩邊。船
頭儘是錄朱彩，船尾儘是百蛇纏。
彩畫神船得已了，只有花橈不周全。花
橈卻要沉香木，橈上卻要牡丹纏。
船上花橈得已了，只有紅旗不周全。紅
旗卻要五色絹，旗杆儘是百藤纏。
船上紅旗得已了，只有鼓子不周全。鼓
子出在何州縣，出在雷州雷縣前。
雷州人人打不響，兒郎打得響連天。船
上鼓子得已了，只有鑼子不周全。
鑼子出在何州縣，出在月州月縣前。船
上鑼子得已了，只有笛子不周全。
笛子卻要南山竹，五音律呂要相連。船
上笛子得已了，只有拍板不周全。
拍板卻要肥株木，六片打得響連天。船
上拍板得已了，只有急拍不周全。
急拍卻要南山竹，竹頭竹尾要相連。大
竹將來破四片，小竹將來破兩邊。
船上急拍得已了，只有閘帶不周全。閘
帶卻要南山竹，人人斫竹留兩邊。
船上閘帶得已了，揀時揀日下龍船。

這一段在「唱船」儀式中稱為「頭稍」，也稱之「看划船」。頭稍結束後是「二稍」，亦被稱為「禳災船」。在「二稍」開始之前，先從族長、房長、紳士及頭人中選出代表對全體宗族成員說些祝福的話。在稍稍休息之後，儀式文本中的「第一鼓」開始敲動。之後，四人接著又唱起來：

(第一鼓)

今日龍船下了水，便請處師來安排。把頭一人張元八，把稍一人羅道元。大會將軍來打鬧，判官把筆坐船舷。腦上頭巾花一朵，桃紅衫子夾胸前。屈原相公出來看，一生不見此龍船。後殿夫人出來看，一生不見此龍船。三隻龍船並作鬥，人人只道我船先。東海廟前劃三轉，只有我船獨佔先。嚇得大魚當江走，嚇得小魚躲石岩。蝦公當初眼不出，只因東海看划船。螃蟹原是打鐵仔，至今留得兩把鉗。初一看到十五歸，看得眼珠出眼弦。正月有個元宵節，二月有個上巳船。五月有個端陽節，七月有個採蓮船。九月有個重陽節，十二月有個送神船。

唱完這一段，稍微休息之後，開始「三稍」，文本中稱之為「劉姊妹」。⁷

(第二鼓)

唱起來時和起來，江邊楊柳是誰栽？太陽廟裏是誰豎？鄱陽湖裏是誰開？唱起來時和起來，江邊楊柳水推來，太陽廟裏魯班豎，鄱陽湖裏九龍開。十里行來不見天，五里行來無人煙。遠遠聽得鑼鼓響，近近聽得人唱船。三步把作兩步走，兩步把作一步行。走到門前不敢進，一是判官問說前。柳義⁸秀才甚愛事，引進客人來唱船。雨傘放在山門外，草鞋脫在土地前。本當進門下劃捧，身上衣衫不周全。腦上頭巾千百補，身上衣衫萬重穿。本當進門先參主，卻要船頭作西方。本當進門下劃捧，三般四買不周全。街頭買筆無筆賣，兔子帶毫上山行，苦竹三年不生筍，街頭筆管大值錢。街頭買墨無墨賣，田真燒墨無松煙。街頭買紙無紙賣，蔡倫造紙未曾早。案頭檢得一張紙，判官借筆無墨填。白

紙上頭添一畫，參拜競渡一郎船。一字上頭添一畫，參拜競渡二郎船。二字上頭添一畫，參拜競渡三郎船。競渡三郎三兄弟，分歸三路受香煙，一郎湖南開藥店，二郎下海販官鹽。只有三郎身在⁹小，手執花橈受香煙。二十四炷雲中走，七十二侯管人煙。參拜劉江五姐妹，分歸五路受香煙，一娘住在桃源洞，二娘住在白茅坑。三娘住在花柳巷，四娘住在月團圓。只有五娘身在¹⁰小，到紮羅裙跳上船。不怕兩邊兒郎笑，聲聲口口要爭先。三字中心直落筆，參拜本廟大王船。大字上頭添一畫，參拜天符大帝船，王字頭上添一點，參拜主瘟坐神船。參拜把頭張元八，參拜八梢羅道元。參拜打鼓劉家仔，手執鼓槌過頭搨。參拜打鑼月家仔，手執鑼子月團圓。參拜搖旗龔家仔，手執紅旗在半天。參拜打鬧竹家仔，船頭跳過船尾邊。打鬧一人多辛苦，參拜船上眾兒郎，參拜諸神一齊了，轉身參拜主人邊。左邊教我參父母，右邊教我參少年。參拜堂前公婆嫂，參拜後頭諸小郎。今夕東君甚愛事，隔年造酒設兒郎。酒是去年九月造，打開壇口菊花香。便將饅頭並酒物，手執金盞萬萬杯。保留主人耕作旺，一年耕下兩年糧。保住主人無橫禍，一年四季保安康。禍來門前偷走過，福來恰似井中泉。保住主人雞鴨旺，朝朝放出滿池塘。早晨放出一百隻，晚間收回五十隻。保住主人牛馬旺，朝朝放出滿山岡。上山吃草下吃水，晚間收回入欄房。保住主人買賣旺，空手出門大船裝。一家大小吃不盡，把來門前置田莊。遠看東邊紅日出，近看紫雲暈滿天。廳前不是久留客，灘下不是久留船。再唱兩句收罷了，打急鑼鼓溫龍船。

唱罷，休息片刻。之後是「四稍」，亦稱之為「採蓮船」。這一段儀式不唱不念，而是由族長、房長的率紳士及頭人更換船畫前的祭品及齋飯。

接著，鑼鼓喧騰，「五稍」亦即「祭爺魂」開始了，唱詞是：

（第三鼓）

吃裏飯了去河頭，撞見魯班水上浮。借問魯班過何去？揚州請我豎高樓。
吃裏飯了去河頭，撞見木排水上浮。借問木排過何去？揚州請我豎高樓。
吃裏飯了去河頭，撞見竹排水上浮。借問竹排過何去？揚州請我織壁頭。
吃裏飯了去河頭，撞見瓦船水上浮。借問瓦船過何去？揚州請我蓋高樓。
吃裏飯了去河頭，撞見磚船水上浮。借問磚船過何去？揚州請我品地頭。
吃裏飯了去河頭，撞見灰船水上浮。借問灰船過何去？揚州請我粉壁頭。
吃裏飯了去河頭，撞見雄雞水上浮。借問雄雞過何去？揚州請我祭龍頭。
吃裏飯了去河頭，撞見鴨公水上浮。借問鴨公過何去？揚州請我祭龍頭。
吃裏飯了去河頭，撞見鵝公水上浮。借問鵝公過何去？揚州請我祭龍頭。
吃裏飯了去河頭，撞見礮子水上浮。借問礮子過何去？揚州請我礮穀頭。
吃裏飯了去河頭，撞見米篩水上浮。借問米篩過何去？揚州請我篩糠頭。
吃裏飯了去河頭，撞見簸箕水上浮。借問簸箕過何去？揚州請我簸糠頭。
吃裏飯了去河頭，撞見碓子水上浮。借問碓子過何去？揚州請我舂穀頭。
吃裏飯了去河頭，撞見風車水上浮。借問風車過何去？揚州請我搗糠頭。
吃裏飯了去河頭，撞見籠床水上浮。借問籠床過何去？揚州請我蒸饅頭。

唱罷，一陣密集的鑼鼓聲後，四人又唱：

傳語船上眾水手，傳語船上眾兒郎。傳語船上龔家仔，手執紅旗在半天。
打鬧一人多辛苦，跳得皮破膝頭穿。遠看東邊紅日出，近看紫雲罩滿天。
廳前不是久留客，灘下不是久留船。再唱兩句收罷了，打急鑼鼓開龍船。

之後是參辭文，和參神文一致，只是將「參見」二字，改為「參辭」二字。至此，第一段「唱船」儀式結束了。之後是第二段儀式，也是從「參神文」開始，一直唱到「辭神文」結束。如此反覆四次，當晚的「唱船」才全部完成。

在鼓樂聲中，侯家唱船的四人，除了聲音要抑揚頓挫外，還要配合船歌做些划船的動作，極具表演性。當晚，村中的男女老少齊集在祠堂，或認真地聆聽船歌，或跟著吟唱，或品嚐果品，也有在祠堂角落中賭博的。整個祠堂燈火通明，熱鬧非凡，儀式往往要到凌晨一、二點鐘才結束，人群在此時才慢慢散去。

正月十二至正月十四，每天晚上基本都是重複著這些程序，舞龍燈，從唱「參神文」及「木根源」開始，到唱「辭神文」結束，每晚反覆唱念四次。

這些天中，村裏家家戶戶都會請來親朋好友，他們來的時候，會贈送主人一些鞭炮或者香燭之類，也有送裝飾在神頭像上的紙紮金花。因為附近各村「喊船」的時間不一，所以每家總會有不少客人，讓各家庭主婦忙的不可開交。

（五）送神

送神的時間是正月十六，但是送神儀式在正月十五晚上就開始了，因而那晚的唱船儀式也和前四晚不同。「頭稍」是相同的，首先也是唱「參神文」及「木根源」。「二稍」，即「劉姊妹」，先念唱「餞神文」。侯家的餞神文如下：

伏以王春元宵，燈花映月增光彩；侯門勝會，人意洽神共歡愉。茲逢餞送之期，容致驢行之敬，縷陳款祝。惴候鑒臨

恭惟兒郎在上，汪洋氣象之高明；聖德
禦天，濯濯威靈之赫奕。人物悉歸掌
握，福極盡屬權衡。十二佳辰，曾請駐
臨於上穀；望五穀旦，仰致祖饒達中
庭。翌日旋旌，來朝走馬。彩旗華鷁，
高飛直上駕九霄；錦纜牙樯，穩載長行
通萬里。侯門稽首以跪送，下里傾心而
歡呼。歌唱太平，願成有年之慶；杯盈
清灼，不盡化日之舒。一抹爽氣罩菁
莪，秀士青雲得路；幾陣惠風噓寒闌
闌，旅人白鑑盈囊。不須飲菊泉，群介
眉壽；無事啜蘇酒，咸樂身康；瑞錦送
麒麟，人人胥賦浣花之句；紫氣繞燕
室，戶戶不勞江陵之風。一路福星，雨
後有人耕綠野；萬家生佛，月明何犬吠
花。幘幘無方，禮濟有象。厚澤常在，
法駕難留。唱徹楊關，上小舟。既來既
往，統率班聯歸華境；不後不先，從此
乘騏驎蓬萊。依然別有天地，於焉轉帆
泊閬苑；久矣，恁樣乾坤。鄙衷既達，
俚句進呈兒郎：

和風江上片帆輕，遠送龍舟到洛城。香
嫋瑞煙霏桂棹，花氲佳氣過銀泓。

彩旗耀月輝行色，鼉鼓驚天壯去程。直
底揚州春色滿，東皇運轉再恭迎。

攀送頭人侯敘倫堂

起神頭人侯某某

謹同中霄弟子侯某某 某某

念唱「錢神文」之後，接著唱前幾個晚上
「劉姊妹」的中唱詞，也就是「江邊柳樹是誰
栽」那段。「三稍」稱之為「祭爺魂」，全團
合唱「吃了飯罷去河頭」那段。「四稍」稱之為
「禳災船」，不唱，仍由族長、房長等率紳士、
頭人更換香案前的三牲及齋飯。「五稍」稱之為
「送神船」，首先是唱「路引」，侯家「路引」
內容如下：

元宵已過駕難留，留恩降福早回朝。明
日拜送社前去，暫到南平廟前頭。

南平廟下好停船，打點人夫任往還。便
把雲帆高掛起，東灣橋過鯉甌灘¹¹。
鯉甌灘上去如梭，仕江口上已相過。借
問前頭何處去？仕江口過是大河。
大河搖到禾埠洲，風恬浪靜水悠悠。指
望斜陽將已晚，城江山下好停船。
城江山下至營前，水府祠庭在岸邊。遇
過其中來去後，已行紅日落西山。
看看天晚日沉沉，喜到城隍大廟庭。會
得鄉中諸神集，大生歡喜便行程。
人夫努力莫勞寒，收拾行囊便上船。槳
櫓雙搖排起興，河邊大驛是螺川。
暫過螺川路未暇，又逢吉水境繁華。三
姑留我他家歇，我要開船過白沙。
夜宿白沙館驛前，風清月白兩翩然。明
朝早起登程去，玉峽灘頭好歇船。
夜來玉峽暫停船，龍母祠庭叩福田。願
借一番風順送，人和早起到金州。
金州江上水潺潺，水泛舟輕人自閑。過
卻清泥和永泰，臨江城下宿肖灘。
來到肖灘阻客船，清江正要打關防。便
從港口批文引，直下豐城問劍江。
劍江逢見客提壺，借問前村有酒無。曲
江三州休要問，直臨市插任君沽。
市插江邊舟暫停，糴些生米掛帆行。看
看來到南昌府，南浦橋頭問路程。
南浦橋頭問路程，水深江闊任君行。來
來往往船多少，樵石江邊夜宿亭。
昨宵樵石宿沙汀，清早開舡天未明。行
到牛欄昌邑過，過州又是宿吳鎮。
吳鎮山下入鄱陽，翹望前川水渺茫。若
遇珠璣並左蠡，匡廬山下是南康。
登山涉水到匡廬，尋見女兒及大姑。贈
我鄱陽灘一隻，看到彭蠡過南湖。
彭澤街頭有酒沽，沽機柴米涇港漁。舟
行小姑去淼然，二水環流落照前。
風定帆懸江欲白，星稀纜急水生煙。銀
槁點破波心月，金櫓動搖水中天。
此日中流還自在，逢逢鼉鼓雜管弦。風
送龍舟行似箭，吉陽轉眼是同安。

同安江上客舫多，有日張帆從碧波。一陣狂風沙夾起，霎時吹過李陽河。李陽河裏水悠悠，浪靜風停好放舟。搖過李陽人沙夾，卻來池口問池洲。池口開船便得風，斜陽光朗照長空。欲來連江司前歇，又過梅根宿大通。月上大通六百丈，忽聞岸上銅鈴響。夜深不覺二三更，急急搖船過荻港。荻港江頭望板磯，茫茫全不認東西。繁昌直下三山鎮，大信諸頭事不虛。且入太平沽美酒，醉來採石臥當空。採石江頭李謫仙，芳名不休至今顯。墳祠千載依然在，坐對青山大勝前。大勝江心水入關，金陵城廓甚盤桓。滔滔流水旋金闕，直投龍江任往還。城策金川儀鳳門，清涼懷遠望吳鎮。三山聚寶連通齊，洪武朝陽見太平。龍灘發棹掛金帆，意氣忙然樂且耽。望遍金陵多勝境，卻來埠口看龍灘。龍灘早起到煙雲，洋子江頭試問津。過了大江歸小港，軸轆絞組過儀真。船到儀真好算程，路平河窄最堪行。便風牽纜停停去，直到揚州大廟庭。洛陽廟裏真繁華，休戀江西草木家。請起諸神齊上馬，榮歸落浦樂繁華。今宵弟子送諸神，舊典完隆便起程。兒郎鑒此微忱意，消災降福及留恩。大生歡喜匆匆去，唱徹歌聲頌太平。橈鼓雙雙歸故里，獨佔鰲頭永播名。

最後仍唱「參辭神」文，至此，第一遍唱船儀式結束。和前四個晚上一樣，要重複念唱四遍。侯先生總結說，「唱船」中，五個晚上的儀式大體相同，只是十五那晚，整個「唱船」中，凡是「參見」二字，除了「參神文」中的之外，都必須改為「參辭」二字，還要加唱「餞神文」和「路引」。

正月十六早上，蕭姓道士再次來到村中，指揮村民把船畫抬出祠堂，放置在祠堂前面的空地。他再次在船畫前擺放香案。康老爺、福主菩薩和娘娘菩薩也要從祠堂抬出，放置在船畫旁

邊。之後，村中每個成年男人都要來到船畫前「祝神」，也就是給神敬三杯（次）酒，道士在每一次敬酒時，都要唱贊一次，¹² 所以這個儀式要花很長時間。

（六）燒船畫

唱贊結束之後，村民把船畫及福主菩薩抬起來，一行人浩浩蕩蕩的來到村邊原來的河流流經處，¹³ 放下船畫並燒毀它。同時，村民也會把過年之前殺雞、殺豬時留下的雞毛、豬毛等帶到船畫燒毀地點，一同燒毀。

（七）安神位

船畫燒毀之後，村民又把康王菩薩、福主菩薩及娘娘菩薩抬回敘倫堂，道士重新給三位菩薩安神位，整個「喊船」儀式就全部結束了。

三、對「喊船」儀式的分析

（一）儀式參與者

儀式參與者主要由兩類人組成：道士和宗族成員。道士一般來自於固定的道士家族，和宗族形成世主關係；禳災的「大神」是附在道士所印刷的船畫中。「船」是禳災的法器，儀式是否有效力，取決於道士的法力。宗族成員則由侯氏族長領導，按照房份輪值負擔儀式費用及其他雜務；識字的宗族成員可能會被圈定唱船歌。儀式中，親朋好友接受邀請，前來拜訪，贈送禮品及觀看儀式表演，在儀式中扮演祝福者和觀眾的角色。村中供奉的康王菩薩、福主菩薩及娘娘菩薩等諸神也要參與其中，整個儀式期間，祂們和船畫一起享受香火，送神時，也要被抬著隨行前去歡送。至於原因，侯先生的解釋是祂們和大神一樣保護地方平安，有責任和村民一起「參神」及「送神」。村中的諸神是儀式中不會說話的參與者，祂們在儀式其間陪伴「大神」，在大神帶走村中污穢後，繼續執行自己的職責，保護一方平安。

（二）對儀式傳統的分析

「喊船」是民俗化的道教儀式傳統。一方面，「喊船」是道教儀式中禳災祈福活動的一

種，具有明確的天師道儀式傳統。流傳至今有關「喊船」的來歷，天師是這一儀式出現的「起因」，因為他淹死了那些大臣，才導致了冤魂無處可去，以致在村中作祟；同時天師又被賦予了高於皇權的法術，可以震懾這些冤魂；而且更重要的一點為天師是得到皇權許可下引導人們進行禳災祈福活動。整個故事中，天師具有高超法力，並且可以合法的運用力驅邪禳災。分佈在吉安縣各個村落的天師道的道士們在家中建了不少雷壇，「師承」了天師的法力，在儀式中扮演天師的化身，成為禳災的專家。人們到道士那裏迎接神通廣大的「大神」，來到村中收集污穢，又在他的指引下送「大神」，使得污穢隨著「大神」的離去而遠離村落。人們相信儀式可以禳災避邪，村落在儀式舉行之後就是潔淨的村落，人們可以得到更多的福氣。儀式中所參拜的神靈，如城隍等，主要也來自道教神仙體系，也能說明這儀式是屬於道教傳統。

另一方面，「喊船」儀式不同一般的道士為地方舉行的齋醮儀式，它擁有更強烈的民俗色彩。理由有三：第一，一般的平安齋醮儀式，道士絕對是主角，科儀文本都必須由道士宣讀。在「喊船」儀式中，道士只在前後出現，中間看不到他們的活動，儀式中最長的組成部分是唱船歌，即「喊船」，完全由村民自己組織，船歌也是由該村文人所作，並不是出自道士之手。第二，唱船時伴奏的鼓樂，並不是道教音樂，而是由村民自己創作而成的。儀式過程中，「聽船歌」的人可以隨意走動，甚至可以在儀式進行的場地進行博彩活動，這和道教其他儀式在進行中莊嚴肅穆的氣氛完全不同。最後，「參辭」的眾神中，相當一部分是屬於民間宗教體系，本地的福主南平大王及本地頗有影響力的康王菩薩、娘娘菩薩等地方神祇在儀式中，都被賦予了代表地方社區的意義，因而說「喊船」是屬於民俗化的道教儀式類別，是一種道教傳統儀式深入民間後的民俗活動。

（三）儀式的意義

首先，對於村落內部來說，儀式是由宗族

組織的集體性禳災祈福活動。儀式來歷中，冤死的鬼魂因為誤解了皇帝的話，跑到祠堂中，以至於貽誤了投胎時機。祠堂這一地點已經隱喻鬼魂的存在會對整個宗族造成災難。因而，儀式要由集體舉行，而侯氏家族的祖先們，也是「大神」隊伍中重要的組成部份。對著船畫唱船歌，「大神」就能收集村中污穢，放置於船中；送神時，「大神」亦能順著船歌中「路引」所指示的方向離開村落，並帶走村中污穢，保證村中一年的平安與潔淨。這似乎關係整個宗族的發展，對於這類儀式，宗族組織是十分重視的，和祭祀祖先儀式一樣認真並積極對待，安排值年「頭人」，挑選唱船歌的「斯文」。接神時，族長帶領該村的頭目人物親自去道士家迎神，一切儀式活動都在宗族組織的安排下有條不紊地進行。宗族成員對於這一儀式，也是非常積極和認真的。他們認為這是必須也是應該要做的儀式，否則那年可能就有災禍發生。一些有經濟困難的家戶，到其輪值當年，就算難以負擔是次儀式的開銷，也不會推脫責任，甚至舉債也要做頭人。無論貧富，都會儘量把果品等準備得豐盛些，以期得到更多的神靈庇佑。儀式給了宗族成員一種心理暗示，深信通過「喊船」儀式，可以驅除災禍、興旺發達。這一儀式，給予宗族成員一種集體安全感，增強宗族成員戰勝困難的自信心，同時又寄託了人們各種美好的願望。總之，在傳統時代的鄉村社會，「喊船」儀式能賦予村民一種超越人類的力量，這正是儀式長盛不衰的奧秘。

其次，對村落外部來說，「喊船」儀式也是鄉村社會的新春慶典，為鄉村社交提供場域。一般來說，臨近的村落進行「喊船」的時間不一，使得整個正月都充滿節日氣氛。村中人來客往，笑語歡騰，龍燈飛舞，鼓聲震天。儀式在祠堂舉行，是公開性，而且帶有表演性質，男女老少均可以參加，村外人同樣可以進祠堂觀看。侯氏宗族在送神的那一天，還會請來三角班演員，表演各種劇碼，吸引附近的村民去看戲。整個儀式不只是屬於侯氏宗族，也是屬於他們整個社交圈，是他們和他們的社會圈子共同的慶典。在這樣的場域中，村民盡可以釋放壓抑在心中的各種情

結，享受一年中難得的放鬆與愉快。儀式舉行期間，侯氏宗族中有錢有勢的家戶往往要遍請親朋好友，大擺筵席，赴宴的客人要帶禮物給主人，送給主人新春的祝福。來的客人越多，客人的檔次越高，就被視為越有「面子」，越有勢力，而且會被認為將會得到更多的福氣，儀式成了鄉村精英顯示自身實力的舞臺。儀式成就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交活動，村民在各村的儀式中經常有見面機會，交流各種資訊，加深親誼。

四、餘下的思考

傳統時期在吉安縣盛行的「喊船」，是一種民俗化的道教儀式，儀式的核心過程是通過船畫上的「大神」收集鄉村中的污穢，起到潔淨、保護、祝福村民的功能，同時也為封閉的鄉村社會提供社交場合。

正如本文開頭所言，「船」作為禳災「法器」，以「送船」為核心的禳災祈福儀式，在南

方一些省份比較常見，學者們也作了精闢的分析。¹⁴但是，吉安縣的「喊船」儀式在發展過程中和宗族活動結合在一起，更俱民俗色彩，賦予儀式更廣闊的社會意義，這是筆者想要強調的。另外，還有一些有趣的問題，根據施舟人的研究，¹⁵天師道至少在南宋時就有了送瘟船儀式，他的依據是《道藏》中的《道法會元》中所記載的〈神靈遣瘟送船儀〉。¹⁶但是，「喊船」儀式同《道藏》中記載的儀式已經有很大區別。後者是純粹由道士完成的，而前者主要的完成者是非宗教人士。這種轉變是如何實現，其中是否和宗族制度有關？還有就是在侯氏宗族的「路引」中，依次出現的地名，表明他們對贛江到京杭運河的河道十分熟悉，甚至對官府的關卡、收稅點及官文批簽處都很清楚，這是否說明侯氏宗族曾經從事過航運或者水上貿易呢？如果這樣的設想成立，那侯氏宗族「喊船」的民俗活動及其經濟活動的關係，就值得探究了。

註釋

- ¹ 這本儀式文本是手抄本，抄寫的時間為民國二十六年，抄寫人署名蕭壽朋，身份不詳。文本上出現了「侯存三堂保存」字樣，存三堂為侯氏宗族第三房的堂號。現在這本儀式文本保存在吉安市青原區胡忠堂手中。儀式文本主要組成部分包括：「木根源」、「第一鼓」、「第二鼓」、「第三鼓」及「參（辭）神文」，「路引」等。
- ² 侯先生生於1923年，小時候上過私塾。其妻子蔡氏生於1925年，1948年嫁入侯家。
- ³ 吉安縣人民地名志政府辦公室編纂，《江西省吉安縣地名志》（1987）。
- ⁴ 在此本侯家儀式文本中就保存著本村三房的頭人名單，從民國丙子年一直排到了丁未年。
- ⁵ 在儀式文本中，每個「見」字的後面都附了一個「辭」字，本文稍後會談及其用意。
- ⁶ 根據這個文本推測，可能在很早以前就有家戶舉行「喊船」儀式，但是侯先生從來沒有聽說過。
- ⁷ 關於「劉姊妹」是何人，侯先生解釋是一群女性，被洪水淹死後成了孤魂，專停附在運氣不好的人身上，所以要燒紙錢，供齋飯超度她們，叫

她們不要附在人身上。

- ⁸ 疑為訛字，應為「毅」字。
- ⁹ 疑為訛字，應為「材」字。
- ¹⁰ 疑為訛字，應為「材」字。
- ¹¹ 鯉甌灘、仕江口為侯氏宗族附近的小地名；禾埠洲、城江山及營前是禾水邊的地名。
- ¹² 文中提及的住在蕭姓村落的道士已經過世，也未能找到他曾用過的科儀書，所以無法得知贊詞的具體內容。
- ¹³ 這地方早已經成了陸地，現在是侯先生的菜地。
- ¹⁴ 參見黃強在，〈中國江南民間送「瘟船」祭祀活動研究〉，《民間藝術》，1993年，第三期，該文章詳細記錄了江南一些地方送瘟船活動的日期，地點及過程。
- ¹⁵ 施舟人，〈《道藏》中的民間信仰資料〉，《中華文化基庫》（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85。
- ¹⁶ 《道藏》（上海：上海書店，1988），第三十冊，卷220，頁376。

晚清亂世中的華北鄉村 ——博愛縣寨卜昌村若干碑記釋讀*

宋永志
中山大學歷史系

前言

寨卜昌村位於河南省博愛縣城東南五里，是豫北地區一個很普通的村落，現由三個自然村組成，即藥王卜昌、油王卜昌及喬卜昌，村中以王姓和喬姓為主，村中的一街、二街及三街現存有數百間建於清代的民居及王氏宗祠一座，整個村莊週邊環繞著近五里的寨牆，這座寨牆是同治六年（1867）年底卜昌村王氏聯合鄰近鄉村為抵禦捻軍的襲擾而建的。該村現存的文獻以碑刻為主，主要有墓志銘、重修祠堂碑記、修廟記及有關王氏賑災的碑記等等。本文嘗試用搜集到的相關文獻對若干碑記加以釋讀，以展現晚清亂世中鄉村整合及宗族再造的機制。文中錯誤之處，希請大家指正！

一、從《王氏家廟記》談起

光緒二、三年間（1876-1877），華北數省旱蝗相繼，持續的災荒使災民流離失所。在經歷捻軍襲擾後不久的卜昌村中曾組織附近鄉民抵抗捻軍的王氏族人再次在災荒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王大溫、王大文、王惟圖、王惟欽及王惟初等人在村內開設粥廠，賑濟寨內及鄰近鄉村的村民。光緒六年（1880），周圍八村落共同為王大溫等人立碑以答謝王家的義行。¹早在光緒五年（1879），王大溫出鉅資捐得山東候補道員一職。這次因賑災出力，經河南巡撫涂宗瀛保薦，奉旨賞加鹽運使銜。²一時間，王大溫成為卜昌村王氏族人中官位品級最高的人物。光緒五年，他開始在村中大興土木，建造本支祠堂——王氏家廟。此項工程規模浩大，歷時近三年至光緒七年才完工，是年秋，王大溫致書給時任吏部尚書的武陟縣人毛昶熙，請他為王氏家廟寫一篇記文，及後王大溫把其刻於石碑上，全文如下：³

光緒七年之秋，王都轉大溫家廟落成，以書走京師，告予曰：「禮傳詳別子之文，而小宗之分有四祭，統明壇祧之數，而大夫之廟有三。溫家自高祖以來繼禰為小宗，若考、若昆皆欲支祠，有志未逮。溫席餘蔭，忝居大夫，後繇同治，繼今逢國大慶，天子覃恩，褒崇其先世，而廟貌闕然，無以奉蒸嘗，私心慙焉。於是思成先志，卜地故居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維良，厚棟大樑，黜堊必以法，丹牖必以文。三年而廟成，凡累世封贈之命，咸勒於碑，以樹以刊，以昭其光寵。廟之中為饗堂，左右為夾室，堂下為兩廡，其南為路門，路門之旁為兩序；又東為齋室，夾路門而立者為側門，其外為外門，夷庭廣階，上可以充於進退，下可以周於步武。更衣有次，庖廡有舍，受厘有所，衣服、祭器罔或不備。由其外以觀則棟宇之恢閎，規模之整竣，嚴嚴翼翼，輪奐聿新。歲時奉祀，溫躬率弟侄子姓肅衣冠入，當必有愾然聞、僊然見，而孝弟之心不覺油然而生者。然則是役也，不有以記之，何以示子孫而垂久遠？俾知溫之所以建此支祠者，故自有說也。」予考王氏為覃懷望族，所居村曰卜昌也，承忠厚近百餘年，益豐以藩，都轉德器宏遠，尤能光大門閥，顯榮祖考，奉其孝享，竟父兄未竟之緒，俾後世有所託賴，是可嘉也。乃不辭而為之記。

誥授光祿大夫賜進士出身經筵日講起居注吏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實錄館總裁國史館副總裁總理各國事務管理戶部三庫稽查京通十七倉大臣加三級毛昶熙撰

誥授修職郎候選訓導陳震書
 詔封通奉大夫欽加鹽運使銜賞戴花翎山
 東候補道加一級隨帶加二級五孫大溫暨

子侄惟熙 功惟修 肯孫琴堂 壽琴堂
 誠 樞 印 鑒 廉
 炳昌 立石
 侄曾孫其俊 恕

光緒七年歲次辛巳嘉平月上澣谷旦
 族人守約刻字

光緒五年，王大溫在捐得四品道員後，朝廷按例封贈其高曾祖考四代，作為品官，王大溫自然有了修建家廟的資格，因此在信中他引經據典陳述自己修建家廟的理由。碑記中王大溫稱自己為五世孫，顯然家廟內供奉了自己前四代的祖先，完全符合清代品官家廟的規格。據現存光緒三年所修王大溫本支家譜記載，王大溫以上四代分別為王啓泰、王蘊緒、王紹業及王怡，而王怡為王問安次子，這也就是王大溫所說的「自高祖以下為小宗」。王問安是卜昌村王氏很重要的一位人物，他在康熙末年創立了「泰順號」，以經營鐵貨為主。現今博愛縣所在的地方，明清時期為河內縣清化鎮，地近華北的冶鐵和鐵貨製造中心——山西的澤州、潞安二府，又是晉商南下的必要通道，自明代這裏就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王氏自王問安曾祖王敖開始經營鐵貨，歷經王來貢、王振德及王問安三代人的經營，到康熙末年，生意日漸興隆，嘉、道之際，王家「益豐以藩」，在「直、東、江、河，賈肆林立」，成為富甲河內的地方大賈。⁴

二、《創建大王廟碑記》所見之鄉村整合

咸、同之際的懷慶府地方社會一直在動盪之中，先是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北伐圍攻懷慶府城達兩月之久。此後，「直、東教會諸匪屢犯河北，沿及郡之邊界，而大河以南，髮、捻諸逆更掠豐擾，皆意圖窺越。」⁵因此，無論是較大的市鎮還是較大的村莊，在此時期紛紛修築寨自保。同治六年冬（1867），捻軍張總愚部從陝西渡黃河，在懷慶府境內盤踞多日，卜昌村成為

其襲擾的目標。此時的卜昌村王氏先後捐鉅資修築了清化鎮及其西關的城牆。因此，當捻軍來襲時，王氏族人紛紛躲進清化鎮內，王氏中擁有都司職銜的王啓俊及其子弟帶領周邊村落的村民數千人抵禦捻軍。捻軍在同治六年冬撤去後，王啓俊等人便聯合喬卜昌、油王卜昌等村共同修築寨牆，也就是今天圍繞這三個村莊的土牆。⁶

在修築寨牆的同時，王啓俊、王大溫及王大文等在寨牆北門外主持修建了一座廟宇，名為大王廟，參與捐資的村莊有六座，除一座村莊名稱在碑中無法辨識外，其餘分別為陽邑廟、西陽邑、南馬營、沈鹿宿及司家寨，皆分佈在寨子的周圍。《創建大王廟碑記》中記載（限於篇幅，捐款人名從略）：⁷

同治丁卯，藥王卜昌里創建大王廟一所。其廟坐落里北，為正殿三楹，拜殿、大門稱之，繚以垣牆。神像金妝輝煌，丹楹續壁，巍然煥然。工既竣，王君灼三囑記其事。予維河自積石而下，曲折數千里入海，於其常也。舟楫泛通，利賴無窮，是以濱河郡邑崇建廟宇，以享以祀迄於今。然而斯廟之建，則固不以其常而以其變。蓋自粵逆蠢動，毫匪繼煽，大河之南殺戮焚掠，蹂躪殆遍，十有餘載，民無甯居，是可哀也。而河北數郡恃河為阻，坦然若無事。賊每臨河窺伺，而驚波駭浪隨時，輒其聚畚掘堤，水轉壯流，賊窘於術，終莫之能渡。眾口藉藉久呼口庇，凡茲居民俎豆奔走，益思所以報答神庥，固宜人有同情。廟之建也，意實肇此。故曰：「不以其常而以其變。」或曰：「是歲也，有神降於里，憑物屢至，里人神之，而廟之役以興，不知君子語常而不語怪變，而庇民廟以祀之，理之，若夫神降之說，事涉誕怪，予故置而弗道云。」

己酉科拔貢侯選教諭東周張慶元撰

邑庠生員安昌韓五雲書丹

花翎同知王大溫 理問王
 總理會首藍翎都司王俊升 幫辦會首衛千 漢然
 王成士 從 總王

大儒 王全智 王克勤 王克寧
九王 同知王大倫 王長年 王守卿
全士 王明夏 同知王惟欽 馬鳳儀

大清同治六年歲次丁卯季冬上澣之吉立

石工王守約鑄

碑文裏提到的大王神，即金龍四大王，在沿運河及黃河一帶的市鎮鄉村多有其祭祀廟宇。明代金龍四大王即被納入王朝祀典之中，清代因漕運的重要，朝廷更是不斷封贈神號予運河樞紐濟甯的大王神，恩禮日隆。⁸作為河內縣最大的商業市鎮，清化鎮中的大王廟也因山西商人的宣導而肇建於隆慶年間，卜昌村王氏泰順號在咸豐年間曾出資修繕。同治年間地方上的亂事打破了鄉村原有的秩序，各個鄉村結合成為相助守望的共同體，以應對危機。因此，在卜昌村王氏主導下修築的寨牆成為鄉村聯盟的象徵，而整合更大範圍的村莊則需要借助神靈的威權。在總理會首中，王俊升即上文之王啓俊，其餘除馬鳳儀外，都為王氏族人。在六村捐款名單上，陽邑廟共有四十多家商號，西陽邑以程氏為主，沈鹿宿村幾乎全是沈姓，南馬營村以郭氏為主。從人名上分析，每個村莊或許都有一個主體的宗族，但是由於此次調查尚未涉及這些村莊，這問題留待作者以後更深入的調查來解答。

三、再造宗族：重修王氏祠堂及《王氏宗譜》

地方上的社會危機隨著捻軍的戰敗而得以解除，卜昌村亦在此時開始重建宗族。同治十三年春（1874），在王大溫的主持及「遠近族人」的共同參與下，重修了王氏宗祠。自乾隆三十年（乙酉年，1765），王紹周倡建王氏宗祠和創修家譜後，至王大溫已歷經三代，將近百年。在同治九年王啓俊去世後，王大溫成為王氏中官階最高的人物，擁有絕對的權威。《王氏祠堂重修碑記》（捐款名單從略）云：⁹

祠堂者，所以妥先人之靈達後嗣追遠之意也。所繫豈淺鮮哉？乾隆乙酉，余族曾祖諱紹周等糾合族眾創立祠堂，上房三間，街房三間。自是祖宗得享榮盛

之奉，子孫得盡瞻拜之誠，洵義舉也。迄今歷時已久，風雨侵削，簷角、屋脊頹敗不堪。余至其中，目擊心惻，曰：「是豈可以對我先人也？」爰謀遠近族人為重修計。僉曰：「善！」余即鳩工庀材，□眾興作上房，街房仍其舊址而補葺之，東配、西配增所本無而創起之，而祠堂之規模成矣；又虔制神龕，敬設木主，□始祖以下本應各設一祖，以別昭穆，乃分支別派。年遠無稽，未敢妄為，謹合□始祖□列祖統奉一主，庶先人之靈爽有所托，而父老子弟相從而祭於其下者，亦足以動如在之誠焉。工既竣，棟宇輝煌，煥然一新。顧謂子侄曰：「此重本之義也。汝曹其識之，勿忘。」爰泐數語，籌諸貞珉，以俟後世之繼吾志者，是為記。

詔封通奉大夫賞戴花翎知府升銜部選分府裔孫大溫沐手撰文並書丹

總理首事裔孫	部選分府 候選同知 從九	大溫 大有 成士	候選同知 長年 克甯
幫辦首事	從典 甲子舉人	九全士 籍鳴夏 廷選	監生 東河分州 惟欽
典籍 監生	克立 網勤 丕清	九香 作哲 守德	鎔 生貴 全立 秉義

大清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季春之月中浣
穀旦

以重修祠堂為契機，王大溫將村內的「遠近族人」整合起來，除了敬宗拜祖之外，剛剛結束的亂事，也是影響他們重建宗族的重要因素，這在當時的河內縣鄉村是很普遍的現象。祠堂的規模比初創時期的「上房三間，街房三間」稍增「東配、西配」，祠堂內也沒有祖先牌位，因無法考證始祖，所以無法以昭穆次序安放歷代祖先木主，只能合用一個木主，與現存的祠堂規制一樣。在重修祠堂的同時，王大有、王大溫開始著手編撰王氏宗譜並繪製世系全圖，至光緒三年始成，這次修宗譜重新梳理了王氏的譜系，團結了

村中王氏各個支派的族人，正如王大溫在家譜序中說：「蓋嘗曠觀於一鄉之中，一家之事，其父子相愛相慈而奉盤匱者，和以順；其兄弟相友相敬而饋籩豆者，樂且孺。無他屬以分，故厚以情也。迨其後，爭起於錐刀，鬻開於田里，爾詐我虞，遂有強凌弱、眾暴寡者，無他誼不親，故恩不逮也。且夫門戶雖分，而仍一氣相流播也。里居雖異，而實一脈相貫通也。譬猶木_i _i，縱枝葉遠敷，非生於一本乎？」¹⁰

再回到本文開頭，在重修王氏祠堂數年後，王大溫又修建了支祠——王氏家廟，從祠堂到家廟，可以看出在王大溫看來祠堂和家廟顯然不是同一類的構築，家廟的修建更能突出他作為品官的權勢與榮耀。

註釋

* 筆者按：2007年8月，筆者有幸參加由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北京師範大學鄉土中國研究中心主辦，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協辦的「2007年歷史人類學全國研究生暑期學校」，之後前往河南省博愛縣寨卜昌村作調查。本文的寫作即基於此次調查所收集到的文獻，對暑期學校為是次調查所提供的資助表示感謝！

¹ 韓五雲，《王君拯饑義行碑記》（光緒六年），碑存博愛縣寨卜昌村王氏宗祠內，「王君」即「王大溫」。王大溫在光緒七年曾與江南士紳一起在懷慶府城內建慈幼義塾，以收養此次災荒中的孤兒，參見民國《沁陽縣志》，卷10，〈教育〉，懷慶府知府卓景濂所作《慈幼義塾碑記》，沁陽市地方志辦公室藏民國抄本。有關光緒初年華北災荒及江南士紳在懷慶府義賑的研究，參見朱濬，〈江南人在華北：從晚清的義賑的興起看地方史路徑的局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頁114-148。

² 「王大溫，現年五十八歲，係河南河內縣人，由監生於同治八年七月遵籌餉例報捐同知，雙單月選用。十年六月，報捐請戴花翎。十二年十月，捐加知府升銜。光緒五年二月間，加捐道員，指省分發山東，試用四年，在籍辦理賑務出力，經

四、結語

本文所釋讀的這三塊碑刻，展現了晚清時期華北一個普通鄉村在捻軍襲擾前後所發生的變化——既有鄉村外部的變化，也有鄉村內部的變化，其中王氏族人中的鄉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無論是鄉村聯合、創建神廟、宗族再造或賑濟災荒，他們都是事件的組織者，同時，王氏族人所作出的這一系列措施還擴大了他們的晉身之階，借助國家捐納制度，他們之中有以軍功獲保薦者、有以賑災出力得捐高官者，從而更加擴大了王氏在地方社會的權威。透過卜昌村的故事，我們對晚清華北鄉村士紳在應對社會危機中的作用有了更多的瞭解，同時，對此時期鄉村內、外部變化的背後所存在的機制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河南巡撫涂宗瀛等於七年正月保奏，奉旨賞加鹽運使銜，因山東停止分發，改指江蘇，茲於九年五月初十日，經欽派大臣驗放，十一日，覆奏堪以發往，奉旨依議。」參見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144下。

³ 毛昶熙，《王氏家廟記》（光緒七年）。王氏家廟位於王氏宗祠南，現已不存，王大溫所立祖先封贈之碑及此碑均存王氏宗祠內。

⁴ 王青選，《皇清誥授奉政大夫賞戴花翎三班郎中分部行走附貢生翼庵王公墓志銘》（光緒二十七年），碑存博愛縣博物館及王氏宗祠內。

⁵ 周仁壽，《重築清化鎮城碑記》（同治二年），碑存博愛縣石佛堂。

⁶ 王□□，《皇清誥贈中憲大夫候選同知卓齋王君墓志銘》（光緒四年），碑存寨卜昌村小學及王氏宗祠內；王輅，《皇清誥授奉政大夫賞戴花翎同知銜特授湖北荊州直隸州州同青臣王公墓志銘》（光緒十四年），碑存博愛縣博物館及寨卜昌村王氏宗祠內。

⁷ 張慶元，《創建大王廟碑記》（同治六年），碑存寨卜昌村王氏宗祠內。

⁸ 有關金龍四大王在運河一帶的崇祀，參見王雲，〈明清時期山東運河區域的金龍四大王崇拜〉，

- 《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
- ⁹ 王大溫，《王氏祠堂重修碑記》（同治十三年），碑存寨卜昌村王氏宗祠內。
- ¹⁰ 王大溫等著，《王氏宗譜》（光緒三年修），現存寨卜昌村王金陵先生處，對王先生在調查期間為筆者所提供的幫助，深表謝意。

《歷史人類學學刊》

第七卷第一期（2009年4月）

論文

1. 敖包的祭祀（劉文鎖）
2. 明清時期徽州宗族的發展和義田——以棠樾鮑氏為中心（郭錦洲）
3. 「藝術家」的塑造——清末以來廣東石灣陶瓷從業員的身份地位建構（黎麗明）
4. 歷史記憶與香港新國際機場周邊地區之遷徙（區可屏）

書評

1. Susan GREENHALGH, *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孫琦）
2. Xiaobing TANG, *Origins of the Chinese Avant-Garde: The Modern Woodcut Movement*（黎麗娜）
3. Nicolas STANDAERT, *The Interweaving of Rituals: Funerals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韓朝建）
4. Dorothy KO,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唐金英）
5. 楊國楨，《瀛海方程——中國海洋發展理論和歷史文化》（張雅娟）
6. Patrick HASE, *The Six-Day War of 1899: Hong Kong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藺志強）
7. Sui-wai CHEUNG, *The Price of Rice: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a*（黃永豪）

維多利亞城的衛生政策 ——殖民者統治手法的演變與士紳社會的自治

黎傑長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維多利亞城的衛生問題，長期圍繞著香港殖民地的早期歲月，爭議不斷的是政府角色與責任。劉潤和用相當篇幅指出，殖民地的醫官提交早期衛生問題的報告，與多任港督的報告，皆是矛盾重重。醫官早已特別地指出太平山區的衛生危機，反觀港督的報告，多是說衛生情況合理或已經陸續改善，甚至如軒尼詩指出因華、洋的觀念差距，才有華人社區不衛生的誤解。¹科大衛認為這場爭議不只是衛生問題，更糾纏上重要政策：維持土地價值與華、洋分隔的統治。²從而可知道，維多利亞城的衛生問題涉及層面廣泛。本文嘗試透過維多利亞城的衛生問題，去考證早期衛生政策的源起與衝擊，香港政府如何定位本身的角色與責任承擔。

一、衛生與名譽

自開埠後，香港政府不斷修訂不同的法令，當中更涉及多個衛生層面。下列就是香港開埠以來第一個60年所面對的衛生問題：

時間	病症/問題	主要地點	重點處理方法
1843年	發熱病毒	黃泥涌村	恢復使用山頂別墅及植林政策
1849年	排水渠道淤塞	太平山區	維修與清潔
1857年	性病	妓院	制訂性病條例（1858）
1877年	家畜的衛生	太平山區	制訂公眾衛生條例（1887）
1882年	臭味投訴	下環區	查維克報告
1894年	鼠疫	太平山區	成立公立醫局

香港政府最早期面對的挑戰便是發熱病毒。李雅各（James Legge）³於1843年由澳門到香港，他將這次遊覽港島的過程編輯成一份報告，內容提及快活谷南端的黃泥涌村，以及渣甸公司在村

內建立的三幢洋式樓宇已因為發熱病毒所污染，引致死亡病例而被棄置。⁴Bruce Shepard也有同樣紀錄：18個月內，渣甸公司的三名合夥人因疫病而先後逝世，終迫使該公司放棄黃泥涌谷。渣甸公司在東角的發展規模龐大，除了大班的東角別墅，還有沿岸的執行基地（包括碼頭、貨倉、房屋、工場、酒吧及瞭望台等），渣甸職工更可以在快活谷內策騎馬匹。大衛·渣甸（David Jardine）曾在一封郵件中說：「我們擁有那山谷」。⁵渣甸公司因為疫病襲擊而被迫放棄此鉅額投資，病毒威力可見一斑。

發熱病毒更進襲駐港英兵，兵營出現大量傷病及死亡個案。Bruce Shepard報告指出英軍傷病率最嚴重的年份：1848、1850、1851、1854。⁶故而香港不衛生的聲譽，遍佈於英海軍、陸軍的官方報告及*The Times*。⁷病毒進襲駐港英兵，不只衍生負面聲譽，而且伏下一連串的政治事件，衝擊香港政府的統治威信。

二、風土病的啟示

基於居港洋人的健康受到威脅，政府必須緊急處理。港督軒尼詩於1881年的回顧指出，開埠初期的發熱疫症，源頭是維多利亞城的建造過程，過度墾伐港島的林木。報告引用港督麥當勞（任期：1866-1872年）的意見：按他在非洲的經驗，例如海拔高與低以及因此而衍生溫度差異等地理因素，皆會影響殖民官員的衛生與健康。因此，麥當勞恢復使用在太平山頂峰的別墅，效果良好。有見及此，富裕的洋商與高級官員，相繼做法，紛紛在山頂建築別墅。另一方面，港督堅尼地（任期：1872-1877年）開始大舉殖林政策⁸，其繼任人亦延續此政策，如港督寶雲（任期：1883-1887年）在1884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及，要

引進數千株合適在亞熱帶環境生存的澳洲品種樹木「桉樹」(Eucalyptus)，有效改善衛生。⁹ 麥當勞發現發熱病毒的源頭，明顯是因為這位殖民地總督累積大量海外經驗，加上個人觀察能力，考證出維多利亞城的開創期間建築施工過程，開墾樹林，翻開大量土地，引致風土病毒暴露於空氣之中，加上香港氣候濕熱，細菌急速散播，嚴重威脅沒有免疫力的居港洋人。政府耗資推動植林政策，加上高級官員與富商紛紛在山頂興建別墅，有效控制發熱病毒的散播，衛生情況得以改善。政府定位清晰，全力承擔衛生改善的工作。

三、性病與貪污

除了發熱疫症，英軍亦要面對性病的威脅。據邁樂文(Norman Miners)的考證，按皇家海軍的要求，香港殖民地政府採取行動，於1858年通過第12號法案性病條例，整理妓院的衛生問題。¹⁰

處理妓院衛生問題的法令的特色，是運用發牌制度去管制妓院。總註冊官為發牌局的負責人。首先持牌妓院必須集中於維多利亞城的東部，妓女的名單必須公開陳列，名單副本須先提交予發牌局審議；第二，妓女必須親自到發牌局，自願申報，聲明不是因被擄掠或被強迫當娼，而且每名妓女必須持有詳細營業紀錄；第三，他們必須每週接受國家醫院的檢查，不合格者需接受強制治療，合格者獲發工作證明書；第四，只有持牌妓院，方可以向洋顧客提供服務。而醫療及警方人員也獲授權，隨時去查察妓院情況及相關檔案，防止違反條例的妓院或染病妓女繼續營業；第五是當士兵受感染，如能認出患病的妓女，妓院必須立刻安排患病者接受治療，並承擔醫療費用。

署理輔政司布烈治(William T. Bridges)表示，這條法令是英國法制史的第一次嘗試透過立法控制妓業衍生的魔鬼。¹¹ 港督寶寧(任期：1854-1859年)也持質疑的意見，向英廷表示，擔心如何執行此法令。¹²

殖民地政府官員質疑一紙的法令無法整理衛生問題，1859年的案例證實官員的憂慮。當年夏季，英軍軍艦「HMS Chesapeake」艦上士兵在香港

獲得48小時的上岸休憩後，竟有195人染上性病，不能再執勤。¹³ 案例明顯指出，士兵染上性病的源頭，就是來自香港的妓院。皇家海軍醫生Dickson向海軍總司令何伯(James Hope)¹⁴ 匯報香港警察與妓院有關連，更指出香港政府已經通過性病條例，建議何伯向港府要求，嚴格執法。

上述案例證明，有關性病條例的執行不力，源頭就是香港警察。其實寶寧早已向英廷匯報，香港警隊存在不少問題，影響效率。首先是歐籍人員，不習慣本土天氣，常常染上不良嗜好，表現不符合紀律人員的要求。第二是警隊陷入腐化，與黑幫有連繫。¹⁵ 寶寧分析，執法漏洞是因黑幫利用賄賂手段，令警隊管理層瀆職，警員執法失效。故而，妓院能否維持合理的衛生水準，警隊的角色就是關鍵。

可以說，香港警隊執法的問題，招惹英海軍司令的投訴，更進一步的發展是，案例提醒英軍醫官，重新檢討海、陸兩軍的公共衛生問題，並得出傳染病削弱國防力量這樣的結論，並且向倫敦政府建議立法進行管制。1864年，英國國會通過傳染病法例：國家用法令監管娼妓業務，其覆蓋範圍包括所有英國本土設有海、陸軍基地的市鎮，並授權予地區警隊建立發牌系統，監管妓院的衛生。¹⁶ 由於受這法例管制的地方，只有英倫與蘇格蘭，¹⁷ 於是理藩院大臣指示香港政府修訂法令，以傳染病條例(制訂於1867年)，取代性病條例。邁樂文指出香港的新例賦予香港警員更寬鬆的權力，執法時無須持有法官簽發的命令，也可以進入任何可疑地方，調查妓院是否無牌經營，甚至可以立刻扣押無牌賣淫疑犯。¹⁸

香港的性病條例就是英國傳染病法例的藍本，透過發牌制度，監督妓院，防止性病傳播。港府奉命辦事。值得討論的是事件過程中，揭露香港警察的素質及其執法不力等問題。例如按劉蜀永的考證，警察司查理士·梅理(Charles May)甚至是妓院的老闆。¹⁹ 這並不是單一個案，就如Henry J. Lethbridge分析，殖民地的貪腐官僚充斥於政府的各個階層。²⁰

總督羅便臣(任期：1891-1898)於1861年引入官學生制度，以吸納優質人才成為領袖骨幹，

企圖取代貪污官僚，²¹ 並且大力清洗警隊的貪瀆份子：於1866年，八名督察因此而被勒令退休，²² 高和爾、堅吾等早期殖民地元老，亦先後離職或被勒令退休。丁新豹認為，殖民地政策出現大方向的轉變，以華人領袖取代這類官僚，統治手法由間接演變為直接。²³

從另一角度看，性病條例的執法不力引起後來的反貪行動。由於海軍總司令何伯的投訴，衍生國家法令監管娼妓業務。邁樂文指出，妓院發牌制度的目標，由1857年至1894年是要合法化院的活動，由1900年至1933年是進一步合法化，成功強化英軍的衛生情況，並且有效防止性病的擴散。²⁴ 值得思考的是，沒有海軍總司令何伯的投訴壓力，羅便臣大規模的肅貪行動會否出現？如前文述說，上任港督寶寧的疑問，曝光香港高層的官員早已了解這情況，由於執法單位的因循，貪污早已是慣性行為；不過，沒有外部力量的施壓，特別是來自英倫官方的投訴，可以推測，他們沒有強化吏治的決心。

自開埠以來，人口結構是維多利亞城衛生問題的根源，人口一直急速膨脹，屋宇供不應求，還有是性別的失衡，男女比例過度懸殊（港府第一次完整的人口調查指出男女比例的失衡，洋人是5：1、華人是7：2）²⁵，形成妓院林立，衍生社會衛生問題。

更值得研究的是，政府的政策定位。發牌制度只在維多利亞城東部的妓院嚴格實施，而位於西營盤的妓院，因不准招待非華人的顧客，執法人員並沒有進行嚴格審查，更寬免定期的醫療檢身，於是變成疾病的源頭。邁樂文估計，患性病率高達百分之四十。²⁶ 寬免政策的原因是華人的反對，故而，兩套監管制度同時執行，²⁷ 於是衍生衛生問題的現象。邁樂文認為港英當局的政策，無積極理會華人社區的需要。Geoffrey R. Sayer指出，當時殖民地政策的重心，只要華人承擔稅務的責任，政府不會干涉這個社區的生活方式，由他們自行處理死亡、疾病及衛生事宜。²⁸ 此類樣情況並不是單一例子，形成往後的社區衛生問題纏繞不斷。

四、查維克報告

傳染病條例並未能擦亮殖民地的招牌，於1882年，英軍再度投訴，駐港軍隊司令透過督軍院（War Office）向理藩院投訴，指出鄰近駐兵基地，即金鐘兵營對面的下環（Canton Bazaar）華人社區，衛生問題嚴重，嚴重影響駐軍的健康。

早於1874年，總醫官的報告已揭發華人社區內飼養家畜的習慣，衍生惡劣衛生問題。可以說，問題不能再由殖民地官僚進行內部解決，惹來英廷的再度干預。於1881年，理藩院派遣工程師查維克（Osbert Chadwick）來港，實地調查，檢視衛生問題。

查維克報告內容，主要分析華人社區的問題，如人口、屋舍及排污結構等一些形成惡劣衛生情況的源頭，更指出太平山區渠道系統的缺失。可以說查維克報告是一個重要分水嶺，他直接提出大量建議，涵蓋衛生設施的規劃、官僚組織的草案及房屋設計的改良，建議殖民地政府盡快落實並實施改革。劉潤和認為，查維克報告規劃出的，不但是往後殖民地衛生部門的草圖，更是支配整個衛生政策的大方向發展路線圖。²⁹

於是，一系列的變革措施出爐：1883年成立潔淨局、1887年通過公共衛生條例、1883年收回官地條例。龍炳頤指出這一系列措施，只限於管制與取締性質，未能徹底解決結構性問題。³⁰ 劉潤和也指出，公眾衛生條例草案的制訂，竟然一拖三年，除了涉及華、洋的衛生觀點，更涉及複雜的金錢利益矛盾。³¹ 而且大規模的土木工程建造，涉及龐大的財務承擔，除非加稅，否則根本無法執行，而且事件觸怒華、洋商人及業主，阻力很大。³² Shelton Hooper是當時潔淨局的委員會成員，他留下紀錄：公眾衛生條例草案的問題，同時惹來歐、華籍的業主分別向政府抗議。³³

種種拖延的情況令查維克報告只是一個空中樓閣，政府沒有迅速地進行改革，衛生情況依舊惡劣，雖然潔淨局已成立，但是按劉潤和引述，香港總商會主席祈連士（James J. Keswick）於1894年的回顧，認為潔淨局並沒落實衛生措施，一再但拖延，終於在一場鼠疫大爆發後，整個衛生變革才正式執行。³⁴

雖然查維克報告得到理藩院力撐，可是衛生政策基本是老調子，是否如邁樂文的分析，總督精於運用靈活的政治手腕，³⁵ 陽奉陰違地架空查維克的建議？祈連士的遲到抨擊，頗為令人意外，可是，為何查維克報告沒有被落實？

而更值得懷疑的是，潔淨局的會議是向公眾開放，媒體可以自由報導，公眾也可以清楚了解工程進度；更有兩名非官守議員，為何公眾（主要是洋商）沒有透過立法局等機制去施壓，迫當局加速處理問題？抑或如龍炳頤分析，洋人早已得悉英廷會派遣查維克來港，將會嚴重影響房地產價錢，故已在地產價值的高峰時刻，紛紛沽售土地圖利，故而他們沒有以衛生問題再向港府施壓。³⁶

邁樂文認為潔淨局的董事會議組成就是問題根源，第一是成員來自社區領袖，業餘的工作態度難以有效監督潔淨署官僚；第二是利益衝突，上文指出社區領袖皆是地主階層，衛生草案涉及建築物的空間，要求地主花不少費用去改善，也需更大筆的投資於新建築物上，在反對力量的壯大下，拖延根本是常態。進一步，潔淨署長的首席醫官也是兼職，他同時是國家醫院的院長，由於要兼顧潔淨與醫療的工作，導致管理失效。³⁷ 潔淨局高層管理的不稱職，表面上是權力的結構性問題，可是也涉及經費問題，公帑的支出受到極嚴格的控制。更何況是動用巨大公帑改善華人社區的衛生，基本上是脫離港府的政策定位。

五、寶雲的手法

港督寶雲處理查維斯報告的手法，可以從他向立法局的官式發言得知。³⁸ 他指出財務的首要問題，當年盈餘為1,095,005元。更有趣的是，在引述查維克報告的段落，首先指出香港可能是唯一沒有負債的殖民地，可是手上盈餘並未能支付數項社區緊急需求的工程費用，當然更無法負擔查維斯報告所指出絕對需要的衛生工程。他強調，得到行政局的同意，香港政府必須維持原則，工程的支出或衍生債務，不能超越單一財政年度的收入。寶雲更指出，當年度的財政預算，已經撥出特殊費用進行衛生改善措施，包括大潭水塘工

程、銅鑼灣填海工程、為新中央市場的購置土地及衛生工作，總支出為173,959元。

另一方面，寶雲政府也採用緊急手段，馬上處理位於下環的衛生問題，移走英軍所投訴的區域內所有華人（主要是家具商店及工場）。³⁹ 自然可以立即消弭英軍的投訴壓力。此處理方法如1849年港督文咸（任期：1848-1854）解決太平山區的排水問題一樣。當年由於垃圾堆積，渠道排水口常常淤塞，影響排污過程。故而，警員負責每日檢查街道以維持清潔，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安排苦力，進行小規模維修渠道，防止垃圾淤塞渠道口。⁴⁰ 兩宗事件均涉及華人社區的衛生，官員以快刀斬亂麻的解決方法，只動用小量經費，符合寶雲的財務策略，也符合政策的定位，以洋人健康為核心，不曾出現偏差。

查維克報告，進一步證明政府處理華人政策的定位，維持沿用手段：淡化處理，故而種種的拖延，並不出奇。Geoffrey R. Sayer指出，當時政府政策的重心，只要華人願意承擔稅務的責任，政府不會干涉這個社區的生活方式，他們自行處理死亡、疾病及衛生事宜。⁴¹ 政策源自義律聲明：殖民地政府承認港島的原住民及其他華人可以維持享受中國法律與習俗的統治。⁴² 不過，絕對不干涉華人生活的政策並不能長期維持，特別是於1894年鼠疫的傳入，⁴³ 華人社區衛生備受指責，港府唯有以另一種策略去應變來維持政策的定位。

港府的應變策略，重點就是准許華人自治，但必須受政府監督，而經費必須由華人自行承擔。總註冊官史美（Cecil C. Smith）的報告中，描述華人領袖的協助，對政府的有效統治是顯著的；並且列出保安、衛生及消防三方面，均由華人買辦、商人等合資。例如集資47,000元，籌建醫院，並且成立基金15,000元作日後的運作經費。⁴⁴ 這個東華醫院的模式，就是史美所指出有效統治的源頭。港府處理鼠疫的問題，除了真的執行查維斯報告的建議，⁴⁵ 還有借用東華醫院模式，批准華商組織各環的公立醫局。

六、政治融合的演變

學者認為，東華醫院的模式顯示殖民地政

府運用間接統治手法，給予少數華人領袖一個官方身份，然後透過他們所控制的組織，間接管理整個華人社區。⁴⁶ 透過這個模式的變化趨向，香港政府的干預力量不斷增加。經過鼠疫之後，東華醫院最終要接受經過西醫訓練的華籍醫生作為主管，冼玉儀認為東華是被迫「政治融合」(political integration)。⁴⁷除了東華的案例，另一個案例是兩個正規警察(督察、警長)於1920年代初先後加入更練團，強化更練團與警隊的聯繫。⁴⁸可以說，這「政治融合」的趨向，反映港府要漸漸強化對華人團體的控制。

1909年的香港政府報告指出，西醫學院畢業生負責管理華人醫院或公立醫局。⁴⁹即是說，政府透過西醫學院的訓練班招募華人學生，收編他們成為代理人，管理香港的華人機構。可以說，華人團體如東華醫院及更練團的控制權，全面受到「政治融合」政策的衝擊。西醫學院及警員學堂都是整個政策的核心，以西式訓練方法，培訓華籍官員，然後讓他們加入華人團體，掌握這些團體的運作，這也是直接統治手法的演變。

不過，香港政府財政資助華人機構，相對來說是十分微薄的。此類政策一直被奉行。如1909年的政府報告指出，公眾醫局管理的三所地區分局負責處理傳染病的患者，是衛生防衛的最前線，每年總經費為34,100元，可是只得政府年撥2,000元，而餘額是由華人自行籌募，佔總經費的94%。⁵⁰更重要的是，公眾醫局承擔重要的衛生及防疫等工作，提供義務醫療及殮葬服務，使政府可以省去大筆開支，這符合寶雲的政策。不過，政府實行此政策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以下一則新聞紀錄列出了公眾醫局的工作，也說明「政治融合」政策歪變的原因：

東華醫院告白：

敬啟者，現因港中時症日有所起，西環分局定於本月十一日，督憲親行啟門。以後遇有患時症者，可報知昇往分局就醫，以華醫、華藥調治，或救治莫及西歸者，遵潔淨例可自僱船，運回故鄉安葬，i i ⁵¹

莫若濂在東約公立醫局開幕典禮上，有以下的講稿：⁵²

i i 香港之街坊公立醫局，即貧病方便之所也，其創立之由來，並與街坊公益之維繫，久為座中久多位所洞悉，毋待不佞贅言矣。闕年，街坊辦理疫症事宜，政府與各紳卹痛惜者，乃棄屍骸之慘劇。蓋公立醫院未設以前，貧病之家因潔淨局例甚嚴，每遇疾病死亡，動輒暴屍骸骨，以為避例之計，此般惡劇層出疊見，聞者莫不傷心。政府亦深為不忍，迨蒙大紳領袖與當局切實磋商，為民請命，懇請各環華人自設醫局，俾於治疫熏洗事宜。街坊例可到場會辦，相助為理。又蒙撫華道通融勸助，設立街症，各任所司，一概規則均蒙許可。旋由政府批准，各環設立醫局，其始為開辦者，乃西營盤方便醫所。該環街坊人眾好義急公，至今膾炙人口，實為自乃疫症之始，先立前導之功，其後各坊接踵繼起，故能實收今日之效。今本坊醫院規模擴張，前程宏遠，非獨為收留疫症、殮殮之便，即貧無醫費之人，老少男女皆可來院診視，或留院就醫，或取藥調理，莫不聽其自便。此乃格外利益，人所共知者也。日前演戲籌款一事，本坊助捐者，固屬熱心，即各環紳商亦異常雀躍，其飲茶水樂輸報效，購票捐款者，莫不翕然相助i i 又本院多用之地，亦由政府撥出，地價不取分文，可見政府之痼瘼在抱。至此院建築費，今已核實，共銀壹萬八千壹百零五圓七毫壹仙i i 該院進支數目大綱如下：進捐款壹萬三千零九十九圓七毫九仙、演戲籌款三千八百九十五圓三毫一仙、銀行利息工百一十二圓零六仙、舊日屋租一百四十五圓三毫、進政府助銀壹千四百圓正i i，另有捐款三四百圓未入此銷表，計由大道東壹號起至燈籠

洲電車頭止，屋共九百間，計樓二千五層，每層約十人，總共計男女大小二萬五名，每年捐銀一、二毫，便有三千餘圓，此院經費有賴矣。

兩份紀錄指出當時鼠疫的影響嚴重，死傷數目引來衛生問題，政府要處理街頭棄屍，防範疫病再度爆發，除了運用司法權力檢控違法者，⁵³還與華人合作在各環設立公眾醫局，處理屍骨。除此之外，醫局還提供免費華醫、華法及華藥的治療，援助貧民。政府更建立醫療基金作為地區醫局的日常經費，提供義務醫療服務。西環醫局便是第一所地區醫局，由港督親臨主持開幕儀式，可見這個政策的重要性。自此，各環紛紛建立地區醫局，響應政府的衛生政策。

華人社區領袖為主導的機構，不但自行處理華人社區的醫療衛生問題，甚至自行抽人頭稅，支付地方醫局的運作經費。從而可知，華人領袖控制社區的稅收。故此，他們掌握保安、醫療及稅捐，自治模式並不是紙上文章，西營盤方便醫所的誕生，證明「政治融合」政策已經開始歪變。

面對此等局面，港府不得不放鬆控制，轉為採用一種遙控手段。從以下這則〈東約公立醫局開幕紀事〉⁵⁴報導可見一斑：

拾七日灣仔東約公立醫局開幕，是日官、紳、商及街坊等者百餘人，三點半鐘齊集，先由李樂予宣讀奉獻，蒲撫華道開門紀念。銀匙序詞云：「今者開幕之禮告成，同人等實深感戴第，念鑄金存像，越王思范蠡之功，愛屋及烏，召伯布文王之政，不有紀念，曷表愚誠。謹將本院開門銀匙奉獻，伏祈賞收不腆之物，不敢云敬。聊效野人之獻芹耳」。誦畢，由莫若濂以英語演說，次蒲撫華道演說，倩何沃生大律師譯粵語，略云：「今日得觀斯院之成立，甚為忻慰，本道廿二年前初來港時，亦居於灣仔，故於是處感情尤篤。今日與諸

君壹堂會晤，更承邀請行開門之禮。此院成立後，東約一帶貧民裨益不鮮，皆由各紳、商、街坊羣策羣力，以底於成云云。」隨由莫若濂將銀匙敬獻蒲撫華道，即開門，各紳商角貫而進，旋即就座。i i 併云本港經費不敷，務求諸君慨助，當場黃汪波、莫若濂、英記、梁瑞山、聯泰、和利、天興、惠記、謙泰、鄭西屏、傅奕朋、三和、譚俊、勝和、隆昌均認每年捐廿五圓，余廣昌每年捐五十圓，余廣昌年捐五十圓，郭述亭、胡蘊初均捐五十圓，併云下年再捐，又陳墨香廿圓、梁榮杰十圓、陳焯卿廿五圓、葉賓五圓、該院掌院費士醫生廿五圓、何隸生年捐壹百圓。聞該醫生在院當義務，不領分文，尤徵好義。茶會畢，在門首合拍一照以留紀念，隨由同人敬贈蒲撫華道、何沃生律師、劉君鑄伯花球各一團，然後散會。

綜合東約公立醫局開幕的兩段報導，政府的協助只是免費撥地及撥款1,400元，其他開支，包括建築費、營運費等來源，均是來自華商的熱烈義務捐款；另一方面，華商以社區領袖身份，在其社區內，除了推動個人募捐及組織義演籌款外，還建立按人頭的募捐制度，要求環內居民，每人每年自動捐款一毫或二毫，以用者自付的原則，使地區醫局得以繼續營運，無須政府再撥款。當中，撫華道擔任一個重要角色，出席典禮，表達親民的態度，更大力表揚士紳的功勞；實際上，這也是一種政治宣傳，顯示官、紳、民的政治秩序。「政治融合」政策雖然歪變，可還是脫不出港府的統治。

從地區醫局的籌建與運作來分析，「政治融合」政策雖出現歪變，可是仍走不出「自由放任」的範圍，港府承認士紳的地方管理權力，鼓勵社區領袖出錢出力支持，借助士紳在社區的威望，才可以創立按人頭的募捐制度，就如一個現代的醫療保障基金制度，支持港府的衛生政策。

基於此種局勢驅使，地區醫局數目擴張，而

油麻地廣華醫院的創辦，也依從這模式，港府公開承認華人領袖的權力，甚至公開讚賞他們的功德。如〈督院答陳啓明演說詞〉：

頃閣下言及廣華醫院，當本部堂未蒞臨時，業已籌劃辦理矣。本該醫院係由前督部堂所選給，本部堂之見，亦深以為該地建設醫院，最為合宜；本港有行善之所數間，其設立之宗旨，專為病人及難民而設，係屬華人所創辦，經費亦由華人籌備，兼由華人充當值理，以華俗辦法治理，極臻妥善，港中所堪稱頌之舉。誠以為此等行事之所為最，即政府亦應為協助者也。試舉可稱頌之一而言，即如政府與各善堂值理均各能相信相助，其政府相信相助之道，非時有所擾及，也非於所行各事，任其施行，絕不相理也。惟斟酌其中，送給地段，刑免收地價，及每年撥經費，為行善之需。由撫華道時為察理，以斟酌損益。撫華道向為諸紳商所倚重，及時與之斟酌，撫華道亦時稟商本部堂。諸君子試思，苟能循此，永遠相助，相信深值得本港一舉，殊堪為遠東一帶之模範。其所模範者何厥，惟各善堂一舉，兼華人對各善堂均有實權治理，臻於至美盡善，使旅港各華人皆受其具賜也。本部堂蒞任至此，至今各行善之所，已見多所擴增，即東華醫院內，已開拓數處，公立醫局亦開辦多間。今廣華醫院又已告成，其建築費至十二萬圓之鉅，凡此均屬華人所；本港行善之所，其料理病人、難民各事，均華人自行辦理，政府甚少理及，深願諸君子壹如前法，辦理中文初級小學堂，進行華童中文教育。⁵⁵

港督盧押（任期：1907-1912）在廣華醫院的公開演說中指出，該醫院的籌建，按華人方法處理，甚至借此承認華醫和華藥的功能，才能成

功完成地區的衛生任務。同時亦公開承認這個規範，華商有實權力管理各善堂，而由善堂管理醫局，官員與紳商應該互相協助，甚至讚賞此模式為遠東一帶的模範。盧押更進一步承認紳商處理華人衛生及其擁有的權力，港英甚至不願插手，更希望他們繼續以此方式，推動當時即將開展的華人小學生教育。

另一方面，值得研究的是「政治融合」的變化。此政策雖然是名義上的成功，但事實上，經過鼠疫的恐慌日子，華人仍舊拒絕西式的醫療。政府處理華人衛生問題，唯有回歸間接統治手法，以華人領袖控制的善堂瓜代官僚機構，執行衛生防疫工作。

除了盧押的演說，另一則報導〈公立醫局演說情形〉⁵⁶，也指出華人的自治功能，在殖民地統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本港公立醫局於廿八日三句鐘假座太平戲院演說醫局事宜，到者約四千餘人，座為之滿，華民政務司為主席，略述公局之源起，為利便華人起見，由劉君鑄伯傳譯。馮華川云：「主席先生並在座諸君，今日到會，蓋為公醫局之究諸君希如此熱心，不勝為大眾感謝。我華人寓居本港而最畏者，為時疫二字，身受者畏割驗，同居者畏薰洗；在疑似之間，尤恐誤會。如此種種畏懼，枕席不安，遂至寧棄屍於道，而不敢報職之故，甚至視港地為畏途；蒲主席、劉鑄伯兩君講求善法，呈請政府准我等自行設立醫居六所，併分派本港畢業醫學士，為各局醫生。凡我華人如有染病之家，即於就近各局請其診視，若非時症，則由該醫生給以憑據一紙，俾其安心調理。如果係疫症，亦可保全，免割驗。如有洗屋，該局亦有公正之人蔽其事，如有因洗屋而毀壞物件，亦由潔淨局主席及劉鑄伯君與弟三人估其價值歸；此後，我居港華人如有染病者，固宜請局醫診視，以藉保全，

至於服藥，中西聽其自擇；或不幸死者，尤不可如前棄屍道路，以傷骨肉之情 i i 。」

上文回顧地區醫局的誕生原因，西醫治療仍不為華人接受，港府又不能拒絕華人寓居，以免影響經濟。⁵⁷ 港府面對兩難的局面，唯有支持社區領袖組織地區醫局，准予華人自行選擇治療方案。有趣的是，受西醫訓練的華醫反而成為華人的護身符，他們簽署證明染病華人無須被強迫送交西醫處理。另一方面，因街頭曾出現棄屍纍骸之景況，⁵⁸ 使政府亦不得不同意，讓因疫病而死亡的遺體運回故鄉安葬，⁵⁹ 公眾醫局的殮葬服務擴展至協助回鄉安葬。⁶⁰ 這種政策明顯就是放寬法例管制，是一種政治籠絡手段，借用華人領袖出面呼籲，統治策略的彈性可見一斑。港府不得不借助華人領袖的聲望，甚至向華人風俗妥協。也可以推測，因疫症而棄屍街頭的情形，尤如當年的義祠衛生狀況一樣，迫使港督麥當奴採用緊急手段，批准華人建立一所華人醫院。⁶¹

上文更揭穿潔淨署的員工在執法時，屢與華人衝突，需要社區領袖出面調解。潔淨署員工執法，涉及嚴重貪污與違規的醜聞。港督彌敦（任期：1904-1907）於1906年委任一個委員會進行調查及聆訊。報告指出該署職工捲入的層面，不但低層員工涉及，洋督察也參與違規活動。⁶² 故而可知，潔淨署功能不單未能有效執法，更是貪污瀆職的溫床，情況如警隊執行性病條例，官僚機構的瀆職，屢見不鮮；於是衍生地方醫局的組成，由華人社區領袖為主導的機構，自行處理華人社區的醫療衛生，甚至可以自行抽人頭稅，支付地方醫局的運作經費。

鼠疫令港府推動「政治融合」，也因鼠疫難以掃除，華人又抗拒西醫療法，加上潔淨署的管理瀆職，迫使是項政策不得不轉變，默許華人控制的善堂，組織地區醫局，自行籌措經費，變相地收取人頭稅，以提供華醫華藥醫治華人及檢運病死者遺體回籍安葬等服務。地區醫局就是一個華人控制地區的象徵，也突出港府政策的定位，經濟利益與社會秩序先行，華人政策的彈性十分

強。盧押在廣華醫院的演說，就是一個總結，公開承認華裔的地位及權力，更鼓勵他們進一步協助推動學校教育。「政治融合」政策的轉變，源於鼠疫，政府以此作為藉口，要強化控制華人組織；也因鼠疫的長期失控，迫使政府讓步，承認華紳的地區勢力，給予他們的自治。

透過地區醫局的例子，反映城市化過程中，華人社區的統治由鄉村管治模式，轉型為地區管治模式，而街坊名稱出現，顯示傳統士紳力量並沒有被瓦解。⁶³ 早期衛生政策顯示，殖民地政府相當倚賴華紳的自治及管理，傳統社區領袖的勢力在地區難以被動搖，而港府甚至要借助他們的力量，執行地區衛生政策，也迫使「政治融合」方向的歪變。

七、總結

殖民政府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經濟政策，其定位重點在於爭取英國人與英資財團的最佳利益。⁶⁴ 陳卓華認為，建構於戰後的工、商業發展模式，政府政策以偏重英資的利益為大方向。

至於殖民地政府面對衛生危機，如直接涉及洋人，方法是劍及履及，如發熱病毒、性病的蔓延，政府不但即刻立法處理，也都耗掉不少公帑去處理，甚至嚴懲執法不力的英籍官員，大力清洗警隊及潔淨局的貪污風氣，改革體制，引入官學生制度，提升統治質量。與寶雲處理查維斯報告的態度有天壤之別。

當涉及華人社區的衛生，香港政府定位清楚，盡量推卸籌措經費的責任，華人要用者自付，甚至於容忍華人可以擁有一定的自治空間，換取社區自行籌募經費，形成不積極干擾政策的基石。

學者分析戰後的工商業及流行文化發展模式，皆認為是造就「自由放任」的政策。郝延平指出，追溯到19世紀，西方列強進入中國，背景是重商主義，「自由放任」就是其核心理論，開放禁制，鼓勵競爭的精神就是手段。⁶⁵ 開埠時的香港政府奉行此類政策，義律聲明就是奉行這個方向，表面上是尊重原居民的傳統，實際上執行分

隔政策，利益基本上向統治族群傾斜，也提供放任的空間，讓華商可以尋找最大的商業回報。

「自由放任」的意義只在於財務方面，殖民政府借助華人菁英份子的勢力，以「無為」方式駕馭華人社會，手段是：「不直接參與」、「不直接干預」。「無為」不是百分百袖手旁觀，而政府透過自由港的政策，吸引華商進駐，再從而提拔菁英份子為社區領袖，扶助他們個人勢力圈的增強，鼓動他們運用個人財力及影響力，編織成一個地方自治力量。整個策略的定位是，殖民地政府盡力減少涉及華人社會事務，公共財務支出便可以維持極低水準，甚至於盡量維持低干預力度。

而這個政策繼續存在，並不因時間而淘汰。如黃霑在研究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興衰過程，指出：80年代中葉，香港社會進行了多元化發展的階段，工業化已經取得了驕人成績。這成績的達成是由各種不同因素交互促成。除了地理上處於

理想位置，而法制的健全，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由體系i i。⁶⁶他認為上述環境因素，源於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他引用陸鴻基的分析，認為政府的「積極不干預」，除了經濟上的「自由放任」外，連文化政策也受影響，居民的自由度遠較其他華人社會為大。這種開放態度，造成港人的文化目光和胸襟廣闊，令社會呈現了多姿多彩的豐富面貌。而陸鴻基的分析指出，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源於盡量減少承擔。⁶⁷可以說，二戰後的文化政策，與早期的衛生政策軌跡一樣。

「無為」的衛生政策，毋須動用大額撥款，卻仍可以維持一個相當有效的統治。「放任」政策，如縱容妓院的監管，雖衍生衛生失控的問題，不過也令華人社會長期享受到相當寬闊的自由空間，工商業、流行文化得到相當興旺的發展；也因為自由港的特色，中、西文化交匯，不斷交流、衝擊，於戰後的歲月，政策延續至文化層面，衍生一個色彩斑斕的時空。

註釋

¹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料1883-1999：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2），頁1-13。

² David Faure, ; The Common People in Hong Kong; in *Hong Kong History: 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488.

³ James Legge除了參與香港早期教育政策的工作，也是重要的翻譯家，得到渣甸公司的贊助，將大量古典漢學書籍翻譯成英語。可以說James Legge是一個中外文化交流的翹楚。Fok Kai-cheong, *Lectures on Hong Kong History: Hong Kong's Rol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90), 7-10; Geoffrey R. Sayer,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0), 195.

⁴ James Legge, ;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1 (1971), 175.

⁵ Jardine, Matheson & Co., 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 An Historical Sketch: Being An Account to Show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Company Came into Being and How It Was Consolidated over the Last Century, (UK: Jardine, Matheson & Co, 1960), 30-31.

⁶ Bruce Shepard, *The Hong Kong Guide 189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Reprint of Hand-Book to Hong Kong*), 54 & 94.

⁷ Geoffrey R. Sayer, *Hong Kong 1862-1919: Years of Discre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5), 22-23.

⁸ *Blue Book 1881: Sanitation and Public Health*; Bruce Shepard, *The Hong Kong Guide 1893*, 64.

⁹ *Blue Book 1884: Speech of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at the Opening of the Session for 1884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¹⁰ Norma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1.

¹¹ *Blue Book 1857: Extract of a Report from Mr Bridges (Acting Colonial Secretary) to Governor*

- Sir J. Bowring.
- ¹² *Blue Book 1857: Extract of Dispatch from Governor Sir J. Bowring to the Right Hon. Henry Labouchere, M.P..*
- ¹³ Trevor Fisher, *Prostitution and the Victorians* (Stroud: Sutton Publishing Ltd., 1997), 82.
- ¹⁴ 海軍少將何伯 (James Hope) 的職位是東印度與中國海域的海軍總司令。Jack Beeching, *The Chinese Opium Wars* (London: Hutchinson & Co.), 260-271.
- ¹⁵ *Blue Book 1857: Extract of Dispatch from Governor Sir J. Bowring to the Right Hon. Henry Labouchere, M.P..*
- ¹⁶ Maria Luddy, *Prostitution and Irish Society: 1800-194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40-142.
- ¹⁷ Trevor Fisher, *Prostitution and the Victorians*, 80 & 84-85.
- ¹⁸ Norma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191-192.
- ¹⁹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 (香港: 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 1998), 頁94-96。
- ²⁰ Henry J. Lethbridge,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221-222.
- ²¹ Henry J. Lethbridge, *Hong Kong*, 221-222.
- ²² *Blue Book 1867: Copy of a Dispatch from Governor 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 CB. to Grace the Duke of Buckingham and Chandos.*
- ²³ 丁新豹,〈歷史的轉折: 殖民地的建立和演進〉,載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第一冊), (香港: 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 1997), 頁98-99。
- ²⁴ Norma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205.
- ²⁵ Norma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191.
- ²⁶ Norma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198.
- ²⁷ Coin N. Crisswell & Mike Watosn,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 Macmillan, 1982), 77.
- ²⁸ Geoffrey R. Sayer, *Hong Kong 1862-1919*, 57.
- ²⁹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料1883-1999: 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 頁13-17。
- ³⁰ 龍炳頤,〈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載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第一冊), 頁226-227。
- ³¹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料1883-1999: 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 頁22及59-62。
- ³² Geoffrey R. Sayer, *Hong Kong 1862-1919*, 64.
- ³³ Shelton Hooper, *The Sanitary Board, in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ingapore: Graban Brash, 1990), 157-158.
- ³⁴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料1883-1999: 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 頁24-25。
- ³⁵ Norma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48-50.
- ³⁶ 龍炳頤,〈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 頁226。
- ³⁷ Norma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145-146.
- ³⁸ *Blue Book 1884: Speech of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at the Opening of the Session for 1884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 ³⁹ Geoffrey R. Sayer, *Hong Kong 1862-1919*, 46 & 149.
- ⁴⁰ *Blue Book 1849: Copy of a Dispatch from Governor Bonham to the Earl Grey.*
- ⁴¹ Geoffrey R. Sayer, *Hong Kong 1862-1919*, 57.
- ⁴² Eilliot's Original Proclamation of Februray 2nd 1841, reprinted in Geoffrey R. Sayer, *Hong Kong 1841-1862*, 201-202.
- ⁴³ 香港鼠疫爆發的源頭是1855年雲南的政局動盪, 引來清廷派遣外省軍隊進行跨省鎮壓, 當地的鼠疫桿菌得以透過軍事活動向各省散播, 香港成為理想疫病出口港。在往後的10年時間, 其他全球的重要商埠亦相繼爆發同類疾疫。從另一方面來分析, 因為透過機械推動輪船, 快速地將疫病散播, 證明當代的香港已是一個重要國際航運中心, 有效率的航運網絡就是一個幫兇。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 著, 楊玉齡譯、陳建仁審訂,《瘟疫與人: 傳染病對人

- 類歷史的衝擊》(*Plagues and Peoples*) (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177-182。
- ⁴⁴ *Blue Book 1869: No. 25 from Cecil C. Smith, Registrar General, to the Honourable J. Gardiner Austin, Colonial Secretary.*
- ⁴⁵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料1883-1999：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頁64。
- ⁴⁶ Henry J. Lethbridge, ; *The District Watch Committee: the Chinese execu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1 (1971);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 ⁴⁷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206-208.
- ⁴⁸ Henry J. Lethbridge, ; *The District Watch Committee: The Chinese execu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217.
- ⁴⁹ *Blue Book 1909: Institutions not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 ⁵⁰ *Blue Book 1909: Institutions not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 ⁵¹ 〈東華醫院告白〉，《華字日報》，1903年6月6日。
- ⁵² 〈莫君若濂宣讀東約公立醫局開幕報章〉，《華字日報》，1911年10月10日。
- ⁵³ 〈被控棄屍〉，《華字日報》，1911年10月11日。
- ⁵⁴ 〈東約公立醫局開幕紀事〉，《華字日報》，1911年10月9日。
- ⁵⁵ 〈督院答陳啓明演說詞〉，《華字日報》，1911年10月日。
- ⁵⁶ 〈公立醫局演說情形〉，《華字日報》，1907年6月10日。
- ⁵⁷ 羅便臣早於1863年向英廷匯報，指出香港能成爲東南亞沿岸的經貿中心，主要是透過華商在香港的經營。Fok, Kai-cheong, *Lectures on Hong Kong History*, 104；大量華人回鄉逃避鼠疫，令香港經濟陷入蕭條。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料1883-1999：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頁37。
- ⁵⁸ 〈莫君若濂宣讀東約公立醫局開幕報章〉，《華字日報》，1911年10月10日。
- ⁵⁹ 〈東華醫院告白〉，《華字日報》，1903年6月6日。
- ⁶⁰ 善堂負責檢運骨殖回籍安葬的傳統，可以參考 Elizabeth Sinn, ; *Comfort the Dead, Comfort the Living: The Repatriation of Migrants; Remains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Papers was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 Indigenous Charities: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arity Institutions across Culture*; held by History Department,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uring 6-8 November 2008.
- ⁶¹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32-35.
- ⁶² Shelton Hooper, *The Sanitary Board, in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158.
- ⁶³ James W. Hayes, *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Connecticut: Archon Books, 1977), 65-66.
- ⁶⁴ Chan Cheuk-wah, *The Myth of Hong Kong; Laissez-faire Economic Governance 1960s and 1970s*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1998), H 11.
- ⁶⁵ Hao Yen-ping,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64.
- ⁶⁶ 黃霑，《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香港大學博士論文（未公開出版），第5章。
- ⁶⁷ 陸鴻基，〈香港歷史與文化香港〉，載冼玉儀編，《香港文化與社會》，（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5年），頁73。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劉志偉編纂《張聲和家族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所編文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東莞張聲和家族文書。張聲和（1853-1938）是廣東省東莞縣牛眠埔村人，曾長期任職於香港基督教巴色傳道會，在廣東紫金、東莞和香港等地傳教。本輯文書，主要是張聲和牧師在他的鄉下東莞牛眠埔村的財產關係文書，包括置產簿、分家書、田產買賣典當契約和借債文書等。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貞泰號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北部灣及其沿岸地區從事商業貿易的商號。本書收集貞泰號及其合伙商號的商業往來文書，包括貞泰號「1928年的股東名單」、「1928-1936年的會議紀錄簿」、代理合約1份、札單17張及商往來書信83件。亨泰號合同2份，年結1本及商業往來書信17件。欽州永壽號年結1本。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本輯文書收錄北海貞泰號年結簿32本，分別為1893，1903-1908，1910-1913，1915-1935年，依年份先後排列；並包括年結簿內夾附的記數紙條，各股東溢利銀及積利息的記錄。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收錄華人企業「乾泰隆」的商業文書，包括376件公司記賬紀錄，189件銀行及錢莊票據，283件商業契據，及各類機構的收據，包括土地物業稅收條、各種公共事業的收費記錄。全書共輯錄848件商業文件。

張小軍、余理民編著《福建村落碑銘》定價：港幣120元

杉洋位於閩東古田東部。本書為編者於1993-1996年間於杉洋進行田野研究時與當地村民余理民一同搜集的碑銘記錄。全書收錄各類記敘碑、祠堂碑、樂捐碑、旗杆石碑及300多塊現存的墓碑，共計碑文400多條。

宋怡明編《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研究資料彙編》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收錄宋怡明（Michael Szonyi）搜集有關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的資料。這些資料的來源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各類專家，如道士、說書者、演傀儡戲者所提供的資料；第二種是五帝信徒所提供的經文、教旨以及碑銘等資料；第三種是旁觀者描述五帝的資料，如地方官僚或西方傳教士所寫的文章。

廖迪生、盧惠玲編，鄧聖時輯《風水與文物：香港新界屏山鄧氏稔灣祖墓搬遷事件文獻彙編》定價：港幣100元

本書收錄鄧聖時所存1993-2002年間有關香港新界屏山鄧氏宗族在稔灣之祖墓搬遷事件中各方面的來往信函、文件、資料和會議記錄。全書共輯錄文獻151條。

訂購表格

歷史人類學學刊	機構				個人				學生			
	US\$		HK\$		US\$		HK\$		US\$		HK\$	
一年共兩期	50		350		30		220		20		150	
兩年共四期	100		700		60		440		40		300	
叁年共六期	150		1050		90		660		60		450	

請以 X 選出合適的項目。上述價格為折扣價，已包括平郵郵費。

開始訂閱期號：第_____卷第_____期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定價	折扣價	訂購數目	合計
1. 劉志偉編《張聲和家族文書》	HK\$80	HK\$64	本	HK\$
2.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	HK\$80	HK\$64	本	HK\$
3.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	HK\$120	HK\$96	本	HK\$
4.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	HK\$120	HK\$96	本	HK\$
5. 張小軍、余理民編《福建杉洋村落碑銘》	HK\$120	HK\$96	本	HK\$
6. 宋怡明編《明清福建五帝信仰資料彙編》	HK\$80	HK\$64	本	HK\$
7. 廖迪生、盧惠玲編《風水與文物》	HK\$100	HK\$80	本	HK\$
小計			本	HK\$
(郵費 + 書價) 合計			HK\$	

香港本地免郵費，海外訂購，每本另加港幣10元，作為平郵費用。

若以美元付款，請以HK\$7.5 = US\$1折算。

付款辦法：

☐ 附上支票/銀行本票* (US\$/HK\$) * _____，支付「香港科技大學」"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請圈出合適者)。

☐ 請在我的信用咭帳戶扣除US\$/HK\$ _____

我將以右列方式支付款項：☐ VISA ☐ MASTER CARD

信用咭號碼：_____有效期至：_____

持咭人姓名：_____持咭人簽署：_____

請把書刊寄往：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傳真：_____電郵：_____

請寄回訂閱表格往：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 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更改地址

____新訂戶

姓名 (Name) : _____ 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 (Institution) : _____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 _____

電話 (Phone) : _____ 電子郵箱 (E-mail) : _____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刊登，作者將獲贈該期十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來稿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審閱。
- (十) 收稿地址：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永豪先生收

電郵：schina@ust.hk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轉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曉玲小姐收

電郵：hshac@mail.sysu.edu.cn